

第四章 战败的文化

大多数的日本人超越疲惫和绝望，充满想象力、多姿多彩地重建他们的生活，这是人类不屈的生命力的证明。有些人花费很长时间才做到这一点，有些人数日之内就摆脱了意气消沉的虚脱状态，另外有些人压根儿就与虚脱状态无缘，他们在听到收音机里沙沙作响的天皇广播的瞬间，就体验到了解放感和生机。人们大吃大喝一顿或者吃红豆饭以示庆祝。他们匆忙从窗子上取下灯火管制的黑纸，让阳光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千百万人开始考虑，没有了国家的指令，自由的个人生活可能意味着什么。¹

多年后，一位批评家回忆起这一切，谈到了当时社会中突然出现的新的“空间”。²人们行为变了，思想变了，遇到了前所未有、甚至也不可能再次经历的新的状况。这是一个流动的、自由的和开放的罕见时刻，新的权威模式和新的行为规范正在形成之中。人们痛切地感到，必须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如果说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随处可见的话，那么新的机会，即能够在军国主义者控制下不可能有的方式行动、言论和思考的机会，也到处存在。当然，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也是军事专制，但是在占领初期，它摧毁了先前日本上层的高压统治，使得民众情绪和民众的独创精神得以空前广泛自由地表达。由于提倡更多的个人自主性，“日本”作为国家的意味在民众间产生了变化。8月15日之前，可以想见，国家是以最空虚教条的概念规定的：什么是“国体的本义”；什么是正确的“臣民之道”；在现存的阶级和性别等级制度中，谨守“本分”是多么重要；哪

些“堕落”和“腐败”的外国思想和艺术是被严厉禁止的；现实生活中在不同场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等等。

当思想理论家们狂热地宣扬所谓“一亿一心”之时，日本的敌国对于这种宣传并不当真。在战争中，对美国和其他盟国而言，日本人的自我吹嘘不过是助长了他们对于这个机器人似的、凶残的、洗过脑的民族固有的种族偏见而已。令人震惊的是，战败显示了多年来所有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教化，竟然可以被如此迅速地丢弃。对国家的热爱存留下来，但是盲信的狂热和令人麻痹的管制被欣然抛弃。人们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处处证明了对于专制主义国家垮台的欣慰，以及对多姿多彩的娱乐活动的接受力——至少是包容力。

在早期，摆脱绝望、创造新的空间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发生在所谓“体面社会”的周边地带。在那里出现了与众不同的战败的亚文化群，成为令人震惊也使人着迷的旧秩序崩坏与打破因习、特立独行的新精神的象征。当然，并非所有的边缘群体都拥有这样的魅力光环。许多“第三国人”——朝鲜人、台湾（地区）人、中国人（以及冲绳人，在绝大多数日本人的眼中）——他们在社会边缘地带的反抗的生存，少有例外地被主流社会视而不见。³

对大众意识造成冲击的边缘群体，来自三个相互交叉重叠的亚文化群落：一是被称为“潘潘”（*panpan*）的专门接待占领军士兵的妓女的世界，她们对征服者的欢迎和拥抱着实令人不安；二是黑市，充满了可怕的活力，引诱人的欲望，践行着弱肉强食的行为规范；三是酩酊大醉、声名狼藉的“粕取（カストリ）文化”群体，他们赞美纵欲，并带来了低俗杂志和性交易等持久的诱惑。所有这三个边缘的世界，不仅具体证明了虚脱状态的混乱和绝望，而且也是以生命力、本能甚至是色情驱使人们超越虚脱状态的实例。

为征服者服务

在被占领的日本，有两个事件使人们看清了卖淫的真实情形。1946年9月29日，《每日新闻》刊登了一位21岁妓女的来信。这位年轻女子讲述了自己如何从“满洲”被遣返回国，由于没有亲戚和经济来源，最终只得在东京上野车站的地下通道中过活的经验：

我住在那里顺便找工作，但是找不到任何事做，连续三天我什么也没得吃。然后在第三天夜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给了我两个饭团。我赶忙吞了下去。第二天夜里，他又带给我两个饭团。后来他要我到公园去，因为他想跟我聊聊。我跟他去了。我就是在那时沦为受人鄙视的“夜之女”的。⁴

虽然当时报纸上时有表达普通人苦闷的来信，这封信还是引起了轰动，尽管是以一种不同寻常的、迟到的方式。1947年12月，受这封来信的激发，一首叫做《星の流れに》（《流星》）的感伤的流行歌曲问世了。这首歌当时并未受到关注。近一年之后，这首歌才开始风靡一时，而它的副歌“谁让我变成了这样的女人？”，也开始被当作严重的社会问题来对待。就普遍的理解来说，正确的答案不是那些利用穷困年轻女性的低级的妓院老板和皮条客，而是无能的政府和官僚机构。

从《每日新闻》刊登来信到歌曲发表的这段时间，一家全国性的电台广播了对一位19岁站街女的访谈节目，记录了有关卖淫的黑暗世界的另一番景象，使公众大为震惊。1947年4月，记者用隐藏的麦克风偷录了被采访女孩的谈话，她在节目中被称为“有乐町的阿时”。有乐町是指东京的有乐町，那儿有许多站街女在营业。阿时被描述为那一区妓女的头目。采访阿时的记者用生动的语言，描绘出了阿时的形象。他说，阿时个头挺高，长相动人，穿着宽松的水手裤，浅紫色的毛衫，头发时髦地用黄色的缎带束起。她的面容长得很美，皮肤白得近乎透明，眉目如画，涂着厚厚的口红。然而记者观察到，阿时说话的时候，有一个令人讨厌的撇嘴的习惯，让人联想起歹徒的形象。当时的一张照片，¹²⁴ 抓拍到了阿时撇嘴的样子。

阿时的话比她本人的相貌还要令人印象深刻：

当然做妓女不好。但是由于战争的灾难，既没亲戚又没工作，让我们怎么活？……我们中没有多少人是因为喜欢才干这个的……但是即便这样，当我们试图改过自新找份工作的时候，人们就会对我们指指点点并说我们是妓女……我已经让好些女孩改邪归正并把她们送回社会了，但是后来……她们总是（她开始抽泣）被挑剔并

被赶了出来，最后只能回到这儿重走老路……你不能相信社会。他们鄙视我们。

九个月后，采访记者收到了阿时的来信，正如一则堕落与救赎的完美寓言。阿时说她听到收音机中自己的声音很受触动，那听起来就“像个恶魔”。因此她离开了并另外找了份工作。她又写道，社会对她仍然很苛刻，她的决心时常都会抵达崩溃的边缘，但她决定坚持下去。⁵

这些令人伤感的“夜之女”的形象，留下了许多难言之隐，而事情必须如此。因为卖淫交易中的很大部分，就是满足庞大的占领军的需求。不得不接待几十万盟国军队的性暗示令人恐惧，尤其是对那些知晓自己国家的军队在他国的暴行、也了解日军强迫别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125



这张“潘潘”女郎或曰“夜之女”的经典照片，是吉田润在东京的有乐町拍摄的。在后来的摄影集中，这张照片被冠以当时一首著名歌曲的标题：“谁让我变成了这样的女人？”

的庞大数目的人而言。紧随天皇的投降广播之后，谣言就像野火一般蔓延，“敌人一旦登陆，就会逐个凌辱妇女”。内务省的情报课，立即意识到了这些谣言与他们自己军队海外行为之间的关联。正如一份警方的内部报告书所述，“那些谈论掠夺和强奸闹得人心惶惶的人，很多就是从前线归来的退役军人”。⁶ 城市家庭被敦促将家里的女人们送到乡下避难。妇女们被建议继续穿着战争年代像口袋似的雪袴，而不要身着更为诱人的女性服饰。年轻的女孩们被警告不要表现友善。然而即便如此，外国人仍然被想当然地认为会要求性满足。问题很简单：谁来提供服务呢？

日本政府毫不迟疑地回答了这个问题。8月18日，内务省发送了一份秘密的无线电报给全国的警察管区，指示他们为占领军特设专用的“慰安设施”，而且要以最大限度的慎重来进行筹备。招募这些设施所需女性的任务，应当由地方警察署长调度安排。他需要动员地方上已经从事卖春业的企业和个人。同一天，东京警视厅的高官会见了东京—横滨地区的“从业者”，向他们许诺了5000万日元的财政补助金，并达成从业者自行筹集相等数量资金的默契。⁷

翌日，副总理近卫文麿要求警视总监亲自指挥这件紧急要务。据说 126 这位前首相近卫公爵，恳请警视总监“保卫日本的年轻姑娘”。然而数日之内，此方针又有了新的变动。曾在马尼拉会见麦克阿瑟一行、安排投降事宜的使节之一河边虎四郎将军回到东京，敦促政府不要直接插手运营这些设施。

此后，政府的角色主要限于正式签署批准方案并提供贷款融资和警力协助。被勉励承担这项任务的从业者，持内务省、外务省、大藏省、警视厅和东京都厅公认的官方扶持通告，募集私人投资。9月6日，政府运营的劝业银行融资3000余万日元，作为政府为这些行动所提供贷款的首期款。大藏省的一位后起之秀池田勇人，在安排政府支持方面发挥了作用，后来他被引述曾说过这样的话：“用一亿日元来守住贞操不算昂贵。”经营者们聚集在皇居前高喊“天皇万岁！”，公开表达对这次为国效劳的赚钱机会的感激之情。⁸

征募少数女性作为保卫日本良家妇女贞操的缓冲器，是对付西方野蛮人的一贯策略。在佩里船长强迫日本废除闭关锁国政策之后，日本就立即特设了为外国人服务的娱乐区。有一位为国献身的年轻女子，已经

在日本近代的神话传说中被誉为爱国英雄。她的名字叫阿吉，曾被指派给1856年上任的第一任美国总领事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为妾。1945年的卖春业者，以阿吉悲哀而色情的形象自我标榜。他们宣称，他们所招募的妇女，将是“昭和时代之阿吉”。

让政府感到意外的是，职业妓女们对成为当代的阿吉不感兴趣。一种说法是，她们害怕美国人，那些在战时宣传中通常被描绘为恶魔形象的美国人，性器官巨大会弄伤她们。特别慰安所的设立者们由此着手招募普通女性。他们在东京市中心的银座竖起了巨大的广告牌《告新日本女性书》，上面有些暧昧地写着：“作为国家战后处理紧急设施之一端，我们寻求新日本女性的率先协力，参加慰问进驻军的伟大事业。”还提到工作职位是“女性事务员，年龄18岁以上25岁以下。提供住宿、服饰及伙食”。⁹

绝大多数被广告吸引来参加面试的女性衣衫褴褛。有些据说甚至光着脚。大多数人都没有红灯区的“卖春业”经验，在被告知将来实际的工作之后，大部分人都离开了。在剩下的女性中，有些人宣布与食宿有保障比起来，更吸引她们的是“为国”献身的召唤。毕竟，这其实就是她们一直所受到的爱国的、自我牺牲的教导。截至8月27日，东京共有1360名妇女被征募，她们很快就会被称为R. A. A.，这是“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的英文缩写。

翌日，就在最初的占领军小分队到达日本时，在皇居前的广场上为R. A. A. 们举行了一个就职仪式。在仪式上，宣读了文辞华丽的“誓词”：

邦家三千年，虽山河相亘古不变，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之恸哭，乃一时代之结束，为极端之悲痛与无涯之忧苦所缚，将向危险的、无尽的绝望之底沉沦。（中略）

时机来临，命令已经下达，由于我等职域所在，作为国家战后处理的紧急设施之一端，被赋予慰安驻屯军的艰难事业。此命令重大。而成功则难中之难也。（中略）

由此同志结盟，信念引领我等勇往直前，通过几千名“昭和的阿吉”之献身，筑起一座阻挡狂澜的防波堤，共同护持培养民族的

纯洁，为维护战后社会秩序之根本，甘当地下之柱石。（中略）

当以一言结束声明。我等断非向进驻军献媚。我等并未有损气节或出卖灵魂。我等只不过尽不可免之礼仪，并履行条约中之我方义务，为社会之安宁做出贡献。我等敢大声直言，是为护持国体挺身而出。重申此言，以为声明。¹⁰

东京共同经营 R. A. A. 的 7 个“卖春业”专门团体也发表了声明。在向“保卫一亿日本人血统之纯洁以护持国体的伟大精神”忠诚严肃地宣誓之后，这些爱国的妓院老板们以惊人的圆滑适应激变的新时代，流畅地运用时髦辞令宣布，希望通过 R. A. A.，“疏通彼我两国人民之意志，并为国民外交的平稳发展做出贡献，为建设世界和平出一份力”。¹¹



美国大兵试着跟横滨的姑娘们搭茬儿。这是 1945 年 8 月 31 日，第一批占领军到达日本三天之后的照片。

当天，数百名美国大兵很快抵达东京大森町的一处 R. A. A. 设施。
129 那里聚集的少数姑娘是最缺乏经验的新手。既没有床、寝具也没有单独的隔间，奸淫行为就在没有隐私的情形下随处发生，甚至是在走廊上。目击当时情景的日本人后来的证言都非常愤怒，说这是无耻的“动物的性交”，暴露了所谓美国文明的“本性”。据说，当时的警察署长都为此流泪哭泣。¹²

一位缺乏经验的 R. A. A. 新人，后来追忆起她第一天的恐怖经历。她被指派为 23 个美国士兵服务。据推算，R. A. A. 女性每人每天招待美军数量在 15 到 60 人之间。一位先前做打字员的 19 岁的姑娘，几乎立即就自杀了。有些女性精神崩溃了，有些人逃亡了。到了 9 月中旬，这种荒唐的“国民外交”多少变得正常了一些。在作家高见顺 9 月 13 日
130 的日记中，记录了他与一位出租车司机的对话。司机说他看到一个女人就像歌剧里的那样身穿艳丽的和服，在一处慰安设施门外迎接一个美国兵。她跳起来搂着美国兵的脖子，并用带日本腔的英语打招呼说“哈罗”。对于日本男性来说，这是使人郁闷压抑的一幕。¹³

由于东京的大部分市区都在空袭中被烧毁，起初没有多少地区可以提供慰安设施。9 月中下旬，东京都防疫课长与谢野光博士（著名女权主义者和诗人与谢野晶子的长子），被占领军当局约请协助将妓女分配到不同地区，以备美军军官、白人士兵或黑人士兵专用。起初，据说被指派为黑人士兵服务的妇女们吓坏了，直到后来她们发现，很多黑人士兵对待她们比白人士兵更加友善。出于对种族和等级制度的谨小慎微的偏见，一些日本人总结说，这种相对的友善，是因为事实上黑人士兵所受的教养，是将“日本人”当作“白种人”来对待的。¹⁴

这种“特殊慰安”设施在东京迅速扩张。据说很快就增加到了 33 所。并且在其他 20 座城市同样迅速地蔓延开来。毫不奇怪，它们在美国士兵中广受欢迎。与其他消费相比，它们很便宜。对 R. A. A. 妓女进行短时间拜访的费用，是 15 日元，或 1 美元，相当于当时日本市场上半包香烟的价格。两三倍这样的价钱，就可以购买一整夜的“个人外交”。¹⁵ 尽管这些服务未能防止强奸和性侵犯的发生，但念及占领军庞大的规模，强奸事件的发生率相对较低——几乎与日本政府的预期一致。¹⁶



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成员合影的日本女侍。此调查团被匆忙派往日本调查战时的空袭效果。

R. A. A. 尽管深受欢迎，起初也得到了胜利者们支持，但是在占领开始的数月后就被废止了。1946年1月，占领军当局命令全面禁止“公营”卖淫业，公开宣称它是非民主的也是侵害妇女人权的。但在私下里，他们承认废除 R. A. A. 最主要的原因，是占领军部队内部性病患者激增。数月后禁令生效时，几乎 90% 的 R. A. A. 妇女性病检查结果呈阳性。同时，美军的第八军，经检测 70% 的兵员感染了梅毒，50% 感染了淋病。当年的4月，主要是为了治疗这些性病，美国才初次将制造盘尼西林（青霉素）的专利许可卖给了日本公司。¹⁷

先前由 R. A. A. 招募的妇女们被解雇了，没有得到遣散费，却得到了一篇豪言壮语的褒奖，大意是她们“为国效劳”，而且是日本女性“纯洁的防波堤”，尽管她们自己的纯洁除外。¹⁸ 当然，公营卖淫制度的结



由于受到性病蔓延的威胁，美军当局很快就在接待美国大兵的卖春设施外建起了“性病预防所”。照片中广受美军欢迎的“Oasis of Ginza”（银座的绿洲），连店名都方便地以英文作为标识。

束，并不意味着卖淫业本身的终结。只是这种买卖进行得更加隐蔽了，而性病仍旧难以控制。虽然如此，这种过渡仍然有其可贵的意义。一张照片珍贵地记录下了公营卖淫业终结的历史时刻：在官方认可的传统艺伎聚集的“浮世”地区的一隅，在外国人专用的慰安设施门外，身着和服的年轻女子们，站在悬挂在墙上的星条旗前，高举双臂欢呼“万岁”以示庆祝。¹⁹

132 为响应盟军司令部禁止公营卖淫业的命令，日本官僚们表现出了罕见的、不同寻常的对人权的细致尊重。1946年12月，内务省公然宣布女性有做妓女的权利，而这一点成了各方达成默契、在指定的“红线”地带可以继续从事卖淫业的公开的理论依据。（指定“红线”区的说法，来自警方在城市地图上所做的标记。在蓝线标示的地区，卖淫行为是被禁止的。）在此后的岁月里，大约有55000到70000名女性，——她们当

中许多人是“第三国”出身，——在上述区域充当全职或兼职妓女。²⁰

“交际花”、“专宠”与叛逆女性

这就是“潘潘”的时代缩影，她们坚强而脆弱的形象：鲜艳的口红、指甲油、时髦服装以及有时令人羡慕的曼妙身姿。她们成了与城市夜景、战后的日本记忆场景不可分离的部分。她们留下的照片，是那个时代最忧郁哀伤和引人遐思的形象：黑暗中斜立的身影，头上包着围巾，臂上挎着手提包，时常点燃或吸着雪茄。她们有许多委婉的称呼：夜之女、街之女、黑暗之女，但是最常用的还是“潘潘”。尽管也出现了做美国大兵生意的男妓，但并未引起公众对他们的注意，他们没有赢得大众的想象。²¹

“潘潘”这个词的来源模糊，但据说是战争时期在南太平洋诸岛的美国人用来指代能够搞到手的女人。194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说，从南方地区遣返回国的日本水兵有时也提到“潘潘”。在美国大兵中，这个词激起的反应是嘲笑、怜悯、同情、异国情调和赤裸裸的性冲动。当妓女们以“潘潘”自居时，它传达出的是同样混杂的印象：绝望和凄楚的感觉，正如流行的解释那样，还有骄傲地公然蔑视传统规范以及对感官享乐的追求。

尽管“有乐町的阿时”痛苦地谈起被“社会”轻视的遭遇，她和她的同伴们在大众的心目中，仍然看起来大胆和反叛得十分迷人。幽默杂志VAN的时事评论栏暗示过这一点。VAN杂志向一系列的名人提问：“什么是当今日本社会最古老（最封建）的特色？”以及“什么是最新的（最民主的）特色？”在一位著名的社会批评家和法国文学学者辰野隆看来，“政治”是当今社会最古老、最无变化的方面，因为它仍然与人民的生活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关联。那么最新和最民主的呢？辰野回应¹³³说，“是‘潘潘’女孩们，因为她们超越了种族和国际间的偏见”。²²

这一评论机警而尖刻，即使是只说对了一半。在某些地区，“潘潘”的生意有严密的组织，不仅依据地盘，还依据接待的客人划分势力范围（称为“岛”）。有些“潘潘”只做日本人的生意，而更多的“潘潘”接待美国人。在一些地盘上，这种区别很严格。那些越界的“潘潘”，往往遭到别的妓女的辱骂甚至折磨。然而辰野即兴的回答，用来嘲弄那些

经常打着“民主”旗号的政治骗局倒也合适。他不仅让人关注在被占领的祖国“国际关系”最隐秘暧昧的表现，而且让人注意到了其种族的维度。成千上万的“潘潘”公开地、适意地与白的、黑的美国大兵为伴。即便被瞧不起，她们也成了对其他种族某种容忍的典范，并以群体的反叛行为标示着不可否认的独立。

尽管“潘潘”的生活本质低俗，但是她们与被压抑的肉体快乐的解放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纵情声色的世界，此前不仅曾经展现在江户时代后期的游郭之中，而且曾经在民间说话中的好色故事、古代宫廷恋爱物语中的男女调情中被恣情表达。她们在肉欲上的自甘堕落，是对军国主义者徒劳的禁欲和自制的最尖锐的批判。尽管可能有些男人震惊于她们对性的直率态度，但也颇有些人感受到了其魅力所在。对于众多的性产业经营者来说，“潘潘”预告了即将到来的性商业化潮流，这种潮流在他们身后仍将长期繁荣。²³

134 年轻女性举出的成为“潘潘”的主要理由，反映了这些“夜之女”暧昧的身份。一项对卖春女的调查发现，她们许多人是战争孤儿，或者没了父亲——实际上在经济和社会安全方面一无保障。相当数量的人是家里的长女，自认对父母和弟妹的生活负有强烈的责任。然而，同一调查还发现，接受采访的大多数人是“自愿”在婚外失去童贞的，而且许多人并不是由于经济状况的绝望而卖淫。尽管有些人将挣来的钱省吃俭用供养自己或家人，其他人则为短暂的欢乐而挥霍浪费，展示出挑战时代整体贫困的奢侈放纵。对1946年和1947年警方围捕的“潘潘”的调查发现，相当数量的人坦言，只是“出于好奇心”才选择了她们的生活道路。²⁴

警方记录的被捕妓女的“履历”，有时以相当可观的细节传达出她们对性快乐的坦承。一位18岁的京都姑娘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前些年在奈良上缝纫学校的时候，一个夏日的夜晚，在公园里，她失身于一位年轻的美国兵。几个月后，他们浪漫的关系中断，她偶然决定成为一名妓女，就搬到了京都干起了这一行。她绝大多数的顾客都是美国兵。她温和地告诉警察，如果一位客人长相特别英俊，她往往不收他的钱。除非生病或是住院，她声称自己会继续追求这种生活方式，不会考虑其他的人生选择。²⁵

卖淫通常比绝大多数妇女能够得到的其他工作报酬好得多，而且职业行话也将“潘潘”以巧妙的传统方式传奇化了。一位妓女不偏不倚地穿梭于顾客之间，则以英语借词“butterfly”称之，即“交际花”。也就是说，她看来以自己的方式，成了一个现代版的“恋上恋爱的女人”。“恋上恋爱的女人”，是十七世纪的大作家井原西鹤的一部著名物语中滥交的女主人公。专做美军生意的“潘潘”也被叫做“洋潘”，“洋”字的含义指的是外国的或西洋的。她们是新时代的阿吉，一群叫做“罗纱緬”的女人的现代版。“罗纱緬”指的是，十九世纪中期在刚刚开放的日本的通商口岸，成为外国人妻妾的女性（她们在照片中留存下来的形象，像“潘潘”们一样悲哀忧郁而引人遐思）。只忠于一位美国主顾的“潘潘”，则以英语借词“only one”称之，即“专宠”。这里古老价值的重新应用确实微妙。正如武士与他的领主、高级艺伎与她的恩主一般，一位“潘潘”也可以是忠诚的榜样。美德留存，只是所指代的对象变了。

135



对日本男性自尊的伤害，是不得不向占领军部队卑躬屈膝，更糟的是胜利者无所不在地和日本妇女乱搞关系。远藤健郎的一幅创作年代不详的漫画，描绘了一位残废的日本老兵，遇到一位由日本女人陪伴的魁梧强壮的美国兵的场面。漫画有一个长长的标题：《自从几年前这两位瓜达尔卡纳尔岛碰面以来，世事变化真是太大了》。

像过去有教养的高级妓女一样，“潘潘”也拥有特殊的才能。以她们的情形而论，最明显的是以多种语言混杂的英语交流的能力。这种妓女的日语和美国兵的英语混杂的语言，被滑稽地称为“潘英语”。能运用这种第二语言，不管蹩脚与否，在战败后的日本是一种很被看重的技能。成千上万的日本男人，也在以占领者的语言跟占领者打交道而奋力生存（他们的洋泾浜英语，有时被嘲笑为“占领军用英语”）。这样摩擦就产生了。“潘潘”跟她的美国兵伴侣臂挽臂，或是兴高采烈地坐在他的吉普车里，笼统而言伤害了国家尊严，具体而言刺痛了男性尊严。同时，这些女性，成了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有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美国化”现象的突出象征。“潘潘”公然地、厚脸皮地向胜利者卖身，而其他的人，尤其是作为特权阶层结交美国人的日本的“良善”国民，只能象征性地这么做。这真是令人不安。

“潘潘”以她们令人尴尬的方式，成为战后时期物质第一主义和消费至上主义的先驱者。在那些年的严重饥荒和匮乏之中，美国人物质生

136



在战争的白热化阶段，胜利者通常将日本敌人当作低人一等的生物对待。这幅照片摄于1944年12月，太平洋战区的美国水兵围观一位日本新战俘“灭虱”。

活的舒适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美国“伟大”，是因为它如此富足。而对于许多人来说，“民主”吸引人，是因为它显而易见是变得繁荣富裕的方法。在普通人之中，没有任何群体像“潘潘”那样悍然地开发利用胜利者的物质财富。她们是美国陆军消费合作社（著名的PX）货品的接收者。而PX在那些赤贫的岁月里，确实看起来像魔法国的宝库：不仅堆满了基本的食品，还有酒和雪茄，糖果和珍馐美味，性感堕落的女性用品，比如口红和尼龙长袜。

这个“美国”的魅力如何形容都不过分。阿时涂抹得鲜艳的嘴唇和花哨的服装，不仅是一位妓女的标志，而且是经历了战争年代枯燥单调的节俭生活之后，美国魔力和时尚秘诀造成的大冲击的组成部分。¹³⁷“潘潘”肉欲的形象，是日本人向往的好莱坞最近距离的存在。甚至资生堂，战前具有上流社会传统的化妆品业的著名制造商，也沾染了它的倾向。资生堂战后的第一款新品是一种像口红形状的“指甲油”。它在美国大兵为伍的女性中尤其受欢迎。²⁶ 对于被剥夺化妆、烫发和漂亮衣服



征服者的眼光，几乎立即就开始对战败日本的色情化，从此造成美日关系中假想的男女角色之间复杂的互动。

的妇女们来说（战时的口号是“奢侈浪费是敌人”），涂抹一点化妆品，即便是一小会儿，也可能是企图摆脱绝望和疲乏的令人感动和可以理解的方式。一位女记者回忆说，正当妇女们脱去战争年代丑陋的肥大雪裤时，美国人来了，带来了她们从未见过的长筒尼龙丝袜。她讽刺地评论说，她们的心灵受到了诱惑，据说有些人就是用自己的贞操换回了一双长筒袜。²⁷

138 捎带礼物，是占领军士兵和他们的情人们之间的操作规程。一旦占领军军官参与这种个人外交，实施起来就更为慷慨大方。这种交往——既包括性交往，也包括物质交换，其规模数量相当惊人。定期的军队换防，持续引进大批新部队补充25万人的占领军编制，况且据大家说，在任期内选择守身如玉的家伙微乎其微。据估计，占领军人员花费在“娱乐”方面的几千万美金，几乎半数到了那个年代的阿吉们手上。²⁸

当时，“潘潘”可能是日本西化过程中的一种新现象——“横向”西化的最明显的象征。先前，西化影响对于国家来说是垂直渗透的，几乎从来都是由精英阶层引入。甚至1920年代看起来像是异数的摇摆女郎文化（flapper culture）的盛行，其“摩登男孩们”和“鲍·克拉拉（Clara Bow）女孩们”，也只在闲适的资产阶级圈子里大行其道，而普通人相对未受影响。下层的“潘潘”，则展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从边缘开始的”流行西化倾向。无论是从实质上还是从象征意味来讲，这些坚韧的、生气勃勃的年轻姑娘，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接近美国。作为享乐主义的、物质主义的、美式消费文化的先驱，没有人能够逾越她们。²⁹

连接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的无处不在的性关系，对美国人了解战败国和它的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占领军中的一些人来说，当地的妇女只是被当作性欲对象而已。这种典型的殖民态度，导致了一起臭名昭著的事件：一辆市郊通勤火车上，所有的日本女性都被美国军警扣留，并被强制送去进行性病体检。一句话，每个日本妇女都是潜在的妓女。³⁰更令人震惊的是，战败国家本身也在蜂拥而来的美国人的头脑中女性化了。突然之间，敌人被变形了，从一个残忍野蛮的民族，弱化成了易于操纵和以备享用的可接受的外来民族。此种享用是显而易见的，“潘潘”就是其化身。昨日日本还是一个险恶、强大的威胁，几乎眨眼之间就被

变形成为一个白人胜利者可以强加意志于其上的百依百顺的女性胴体。同时，占领军和日本女性之间的“亲善”，无论是否为卖淫关系，在某些情况下，也成了种族间的喜爱、相互尊重甚至是爱的起点。这也是一种象征。对各方而言，无论是如何参与其中的，这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文化事件。

黑市创业者

再也没有绝对神圣的事了，而且每件事看来都相互联系在一起。那年月有句风凉话说：女人做“潘潘”，男人做黑市搬运工。“黑市”和“黑暗之女”这两个词的共同之处是，都有一个“黑”字，黑暗的“黑”。一本在战时宣传得力，文章和插图才华出众的幽默杂志《漫画》，以一幅漫画捕捉到了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关联：一位身穿旧军服、满脸髭须的大块头恶汉，正在向一位战战兢兢的市民搭茬儿。为他设计的问话是模仿那首关于上野车站贫穷妓女的感伤歌曲：“谁让我成了这样的男人？”³¹

然而，在这两个黑暗世界之间确实有天壤之别。“潘潘”的王国是高度美国化的，反之，黑市，即使美国大兵在其间出入闲逛，也始终完全是属于日本人。它那来源于黑社会匪帮独特的行业黑话，与“潘潘”们的洋泾浜英语，形成了鲜明对照。例如，在大阪的黑市租一个摊位需要交“场地费”，日语叫“ショバ代”。这是黑市隐语将“场所”二字颠倒过来的说法。³²“潘潘”的世界基本上是性欲的，只是偶尔掺杂暴力，而黑市几乎永远是弱肉强食。男人们携带枪支，游戏规则被强制执行。没有人会因为顾客长得英俊或者可怜、绝望，甚至饿得要死而白给东西。黑市里没有多愁善感的余地。这些违法行为，常常以面目柔和的委婉说法进行伪装，不只有“自由市场”的叫法，还有可爱的“露天市场”或“青空市场”的说法。但是无论怎样掩饰，说到底，黑市仍然是一个心肠冷硬、交易无情的场所。

尽管一般人会低估卖春业所占的经济地位，但是没有人不清楚黑市无与伦比的经济作用。对于许多日本人而言，黑市才是现实的经济。黑市几乎与日本投降同时出现。事实上，天皇玉音放送前一星期，《朝日新闻》就曾发表一封来信，以严厉的双关语警告说：逼近的敌人将设法

140 利用“黑暗”，也就是说，利用黑暗的卖淫业和黑市。³³ 8月18日，战后的黑市迎来了盛大的“开业庆典”。东京的主要报纸都刊载了巨幅广告《致转型工厂和企业家的紧急通告》，广告许诺以“适当的价格”进行销售，邀请人们携带生产的样品与广告发布者关东尾津组联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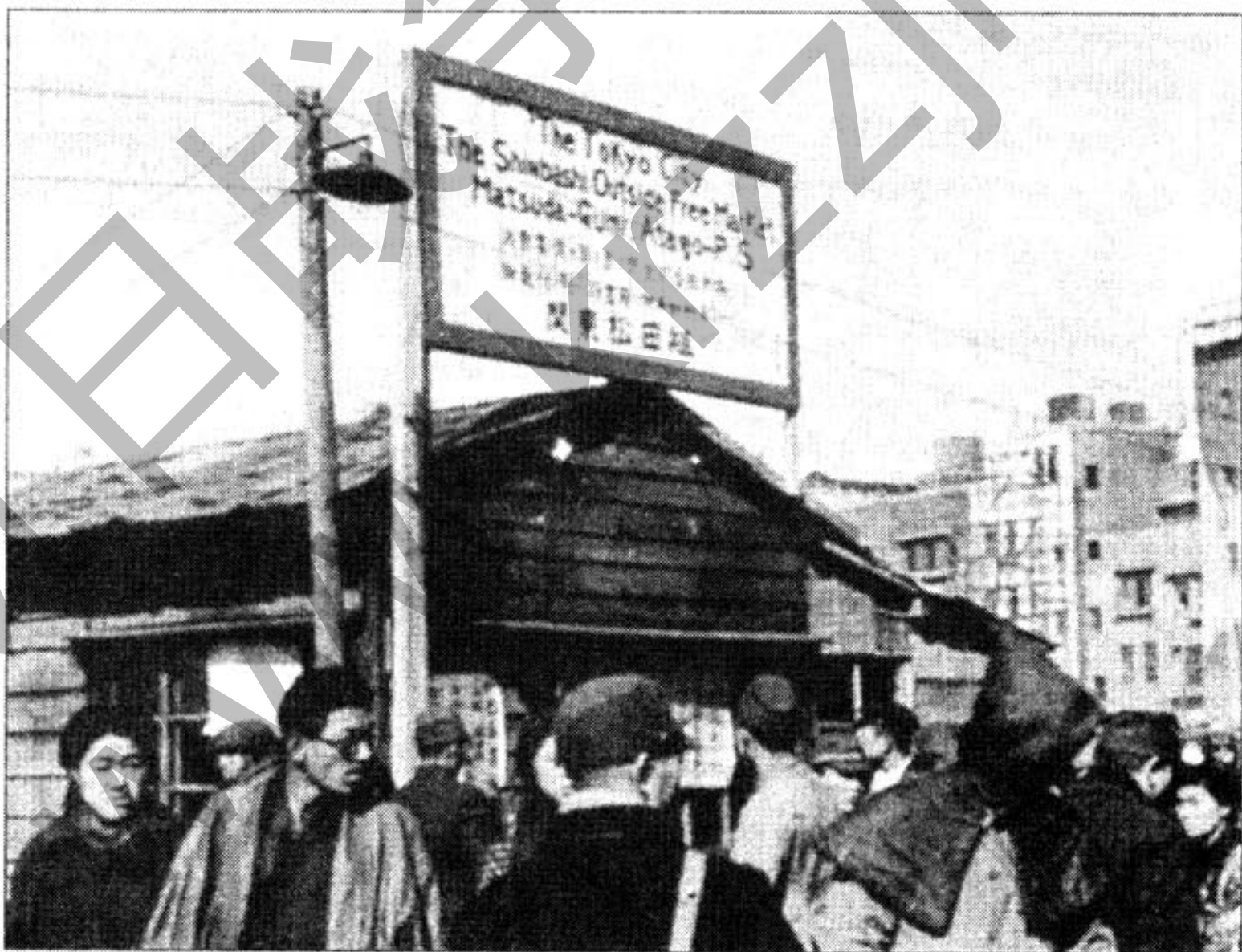
小工厂主们蜂拥来到尾津组在新宿的事务所，因为战争结束后，他们再也无法靠转包军事订单谋生。尾津组的老板很快成了新日本最具活力的企业家之一。据市场传闻说，他鼓励制造商将军刀改成餐刀，头盔改成水壶和煎锅。两天之内，他策划了新宿黑市的开幕。这个黑市由贩卖各式杂货的露天杂货店和货摊组成，并打出了振奋人心的标语：“新宿之光”。到9月份，这条标语被做成一幅由11700瓦的灯泡组成的巨大广告牌，甚至在附近的几个电车站都能看见。距空袭结束仅仅数星期，在烧毁的城市的夜幕中，这面“新宿之光”的巨大招牌，为绝望的人们展示出一幅难忘的乐观主义景象。起初，这些发展获得了媒体热诚的欢迎。³⁴

到9月初，各大城市都出现了“青空市场”，而且往往是自发形成的。有时情况是，退役军人和失业工人到乡下去，带回装满货物的背包，就开始立地叫卖。这种自发的商贩很快就获得了一个绰号，叫“立卖”者。一位市场商贩讲述了他“开店”的经历：他将一桶活的田鸡放到路边上，买卖就算开张了。他把一些田鸡卖了钱，剩下的田鸡换回了马铃薯粉、饭团、面包之类。以此为基础，他的新营生就开始了。据传闻，一位遣返士兵突然想起将自己穿的裤子卖掉，就干上了这一行。当然黑市上最黑的故事，还是与大阪的新兴市场有关。那里交易活跃的毛毯和衣物，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许多衣物直接来自诊疗所，上面还沾着肺结核患者咳出的血迹。大阪经营这种生意的商人，互称“おシャカ”，这是对佛教虔诚信仰的一种残忍的戏称，因为“おシャカ”是佛陀的意思。³⁵

到1945年10月，大约有17000个露天市场在日本全国遍地开花，
141 多数是在大城市。仅仅数月之后，单是东京一地，众多的市场上就有76000个露天店铺，每个摊位日均接待四十余位顾客。与此同时是黑市组织的大洗牌，这有时是一个残酷的过程，通常在教父式人物为首的黑帮领导下进行。在东京，各种帮派之间划分黑市地盘相当严格。新桥地

区的市场被松田组控制，浅草区是芝山组，银座区是上田组，池袋区是关口组，新宿区则由尾津组与和田组控制。³⁶

黑帮对大阪“自由市场”的控制，遵循同样的规则。在那里组织梅田市场的森本三次，是个格外神气活现的人物。他乐于认同除暴安良的侠盗传统。1945年末，森本被从菲律宾遣返回国，回到家父亲已经去世一个月了。他的父亲是地方政坛上一位有权势的人物。应市议会议长之邀，森本跟他的手下开始整顿梅田市场。他描述梅田市场是个外行们的大杂烩，被一小撮恶棍所把持。用森本的话说，“这是个弱肉强食的冷血的时代。我尽己所能阻止它，但在这个年代做日本人真的很可悲”。森本的工作装备包括一件皮夹克、一把揣在怀里的刀和一把挂在腰上的手枪。当警察无计可施的时候，他就自己“照管”局面。不久，有人出大价钱悬赏他的人头。很快，大阪黑市的巨大扩张，就远远超出了他的势力范围。1946年7月，大阪市政官员估计，大约有10万人以黑市买卖谋生。其中约80%是复员军人和失业工人。在黑市的常规经营者中，60%是男性，30%是女性，剩下的10%是儿童。³⁷



142

直到1949年左右，黑市一直支配着日本的经济。在黑市的组织管理方面，像松田组这样的黑帮扮演了公开的、主要的角色。

在这些市场中有一部分生意，是空袭中无数店铺被毁的城市小商贩们经营的，这些买卖是合法的。另一方面，大量的交易是不合法的。东京松田组控制的黑市，在高峰期可达两千人，是这些交易复杂和不稳定的例证。松田组的势力始于“恩主”（这是沿用封建时代的说法）松田义一组织小商贩们在新桥站周围集散货物并开设店铺之际。有东京都政府和当地警察做后盾，松田开始承担批准商贩交费营业的职责，以及提供实际的服务，如照明、提供卫生设备和垃圾收集等。他更多依靠自己的帮派成员而不是警方来维持秩序。³⁸

到1946年初，新桥市场一直有十分合理的结构，名义上处于警方的监管之下，通过一个名为“东京露店商同业组合”的协会进行运作。营业执照须由当地警察署签发，而且通常专门供给符合以下条件的各色人等：战争负伤者、战死者遗属、残疾人士、原先的露天商贩，以及战争中失去店铺的零售商。新桥市场大约80%的商贩，是以此方式登记在册的。然而据说在东京其他地方，约有80%的营业者从未进行登记。

143 市场兼有合法与非法的进货渠道：有来自田舍的农产品，有来自渔村的海产品，还有来自旧时军队的储备品。许多美国货也流入黑市，往往是由“潘潘”从客人那儿得来的。商贩们也跟占领军人员做些私下交易。上野的黑市甚至特辟了一条“美国横丁”，专门买卖这种货物。很快，经纪人的等级制度也出现了：最上层的经销商经手数百万日元的货物，通过两到三级的批发商，转到“卸屋”（批发屋）手中，由“卸屋”直接将货物交付商贩。在这个阶梯的每一层，获利20%到30%是正常的。前期的某些市场上心狠手辣的经营者的，每天赚的钱可能达到8000日元。甚至有时被称作“花生豆”的最普通的小贩——这显然是嘲弄他们像卖花生小贩一样的卑贱地位，每天也能赚到50日元。在新桥市场，松田组通常依靠150名手下来维持秩序、收保护费之类。他们得意于被受管辖者按旧时的规矩称为“大哥”，并挣得他们每月的收入600到1000日元。除黑市买卖之外，松田组还插手建筑业，并为占领军配备和监管日常所需的人手。

黑市交易伴随着猛烈的竞争。1946年6月，在“新桥新生活市场”建设计划大力宣传两个月后，松田组的老板松田义一被某位原帮派成员刺杀身亡。更有甚者，由于种族关系紧张，争夺地盘的战斗加剧恶化。

像卖春业一样，黑市也有一大批“第三国人”的代表，他们没有选择遣返归国而是留在了日本。组织精良的朝鲜帮和台湾帮与日本黑帮同台竞争。7月，这些蓄势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为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一场涉及数百名台湾商贩和上千名松田组暴徒的暴乱，波及相邻的涉谷区，升级为在涉谷警察署附近的枪战，导致7名台湾人死亡，34人受伤。警察一人身亡，一人重伤。

“涉谷事件”引起了多方面的反响。警察和台湾人、朝鲜人社团之间早已存在的敌对情绪摩擦加剧。社会针对“第三国人”的偏见加深。公众对黑市弊端和犯罪率增加的许多愤怒，开始指向非日裔的亚洲人。¹⁴⁴另外，警察在控制黑市方面的无能也暴露出来，使警方受到公众的嘲笑，引发了警察队伍士气的低落。尽管占领军当局在此事件后试图加强对黑市的管制，但是他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³⁹

警方在黑市问题上的表现的确差劲。如果不是彻底的腐败，至少也是贪污受贿；即使不是完全的无能，至少也是被折磨得焦头烂额。一个老套的传闻小故事——被偷的外套案件，巧妙地反映了这种状况：大阪市政厅的一间办公室里有人大衣被偷了。大衣的主人当时一发现情况，就凭正确的直觉直奔当地的黑市。两个小时后他在那里发现了自己的外套，售价3500日元。他召来了两位警探，警探们建议他自己跟黑市老板交涉。于是他只好跟卖自己外套的商贩讨价还价，商贩神态自若地以500日元的价格将外套卖给了它的主人。当时外套的主人作为市政府的职员，其基本工资每月只有700日元。⁴⁰

这种自上而下的体制腐败，很难培养人们对政治的信任感，也不可能使人们对黑市之外的“民主化”进程产生信心。此外，“自由市场”这种公然的弱肉强食的本质，对于日本民众来说，具有某种类似于休克疗法的效果。日本民众向来被教导相信：作为一个民族和文化，他们具有独特的“家族”意识，这种意识让他们相互扶持，牢牢团结在一起。作为一名作家，坂口安吾当日评述说，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实在令人感到不寻常。仅仅在数月前还乐于为国捐躯的人，按照战争年代的教条说法，打算樱花般纯洁、优美地凋谢的人，现在正无情地欺诈自己的同胞。

后来，一些黑市上的小商贩也承认了这一点。正如原来的士兵，无

论何时何地回顾起自己见证的恐怖场景或者犯下的暴行，总是满怀敬畏，就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后来做了新闻记者的古沢公太郎，回想起当战争结束，他和他的同学们在临别之际，充满理想主义地发誓要为重建祖国努力工作。而半年多的时间里，他真正所做的只是掠夺弱者。疲惫的母亲领着啼哭的孩子，来找他出卖一件珍贵的和服，而他就会以虫蛀破旧为借口杀价。他甚至对自己的一位亲戚也这么做过，尽管他知道亲戚家被炸毁了，而且母亲卧病在床。“大和民族”的团结无所谓，亲属关系无所谓，政治也无所谓。坂口回忆说：“天皇放弃神圣地位，占领军发布自由、民主方针，所有这一切看起来，跟黑市上聚集的那些黑暗的面孔都毫不相关。”

在这种情形之下，许多男人和女人都饮酒过量，正如许多妓女将挣来的钱浪费在堕落享乐上一样。大阪黑市的一位胆小的商贩辛辣地述说：“我讨价还价地进货，然后讨价还价地卖掉它们。为了麻痹良心和鼓

145



在每个主要城市，“露天”黑市都繁荣发展。1946年东京上野车站附近，商贩们在售卖家用五金器具。这些消费产品在战时近乎绝迹，当时金属一类的重要资源都挪用于军需生产。

起勇气，我们许多商人在做生意的时候都喝粕取烧酒。对我来说，因为胆小怯懦，每天都很艰难，而且受尽了伤害。”一位不那么懦弱的商贩，回忆起一天挣到工人一个月的平均工资时的兴奋。没有人想着为将来储蓄。毕竟，根本就没有明确的未来，有的只是无尽的通货膨胀。因此，从每天挣来的钱中留出够明天做生意的钱，他和他的伙伴们就会将剩下的钱破费在饮酒嫖妓上。他努力地回想那褪色的记忆：“我喝酒，试着忘记浮萍般漂泊不定的生活。”

有时黑市人生呈现出一种精致与堕落近乎完美的融合。只要出得起价钱，各种东西都买得到。在一处黑市的一角，定期赚到大钱的商贩们，会聚集在一位“第三国人”周围，那人卖一种邪恶的饮料——飞机润滑剂用的乙醇和人工甜味剂合成的酒。他供应的下酒菜，任何时候在日本也算得上是珍馐美味——海胆沙司拌海蜇。尽管讲述这个故事的人负担不起这样的奢靡，但他在成为黑市商贩之后的半年间，的确想尽办法继续不停地喝酒，而且还能活下来将这些经历告诸后人。⁴¹

还有许多注定不会出现在日本战后复苏的经典报道中的不光彩故事，也暴露出了完全自私的生存态度。贪婪和颓废的另一面，是胆大无畏的生命力。黑市上无法无天的家伙，穿戴着自己偏爱的“三种神器”，以显示对“良民”社会的反抗精神。他们所谓的“三种神器”——夏威夷汗衫、尼龙腰带和橡胶底鞋⁴²，是对天皇佩戴的神圣象征镜、剑、玉不敬的戏仿。黑市商人跑到乡下接收整列车厢的货物，在那里饮酒唱歌直至酩酊大醉。垄断渔产品市场的商人，驾驶自己的船出海，围住捕鱼船，以两到三倍的市场价格直接在海上将捕捞品全部吃进。向来被认为是天皇忠实臣民中最谦卑恭顺的农民，照样毫不留情地回绝那些出不起黑市高价的穷途末路的城里人。这种下乡进行的艰难交易司空见惯，以致城里人都热切地相信，农民们只要将手里的百元大钞攒到一尺厚的时候，就会召集庆祝宴会。⁴³

这个市场的生命力是无可置疑的，做什么生意的都有：从叫卖美军兵营和占领军人员宿舍的剩饭做成的回锅菜（“残饭”或“杂烩”），到批发偷盗来的机械和建筑材料，乃至放高利贷。他们没有花费时间奉承美国人，或是进行客套虚伪的闲谈。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现得比那些佞依在征服者膝下、装出正义的嘴脸、暗地里却从黑市上大捞好处

的著名政治家、资本家和前军官们更加诚实。

尽管黑市弥漫着日本人和其他亚洲人之间的紧张气氛，并不时爆发暴力冲突，但是这里也是他们多少能够进行日常平等往来的少数场所之一。以日本历史学家善意的立场看来，穷困的日本人、朝鲜人和台湾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聚集到黑市上。诸如阶级背景、教育程度或先前的职业等因素，在个人交往中影响甚小。尽管民族和国籍问题仍然重要，但是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也比一般民众更为普遍自然。如此说来，身处边缘的黑市商人，或许对社会造成了比他们自身的非法行为更为严峻的挑战。⁴⁴

更加坦率地说，黑市上劳作的男女，是毫不掩饰的注重实效的物质主义的例证，甚至是勤奋精神的典范。在《朝日新闻》的一封读者来信中，一个男孩认为当黑市商贩没什么不好。他的哥哥是黑市商贩，每天凌晨两三点起床，乘坐拥挤的火车，赚点蝇头小利，勉强维持母亲和四

147



当胜利者们抵达日本时，他们发现这个国家很少有私人汽车。更有甚者，许多汽车不是用汽油而是用木炭作燃料。1945年10月拍摄到的这位出租车司机，正在给他烧木炭的汽车加燃料。

个弟弟的生活。他因此很敬佩哥哥。男孩认为，哥哥比那些东奔西跑搞示威或者破坏活动的劳动者更令人感动。他本人中学毕业后，也打算走哥哥的道路。

大约一周后，一位六年级的女生写信回应说，做黑市生意，并不比参加劳动者抗议活动更令人钦佩。她质疑，如果整个劳动阶级都变成黑市商贩，那将会发生什么？她的结论是“我想，政府会为产生这样的社会而感到有罪。建设新日本的目标，应该是创造一个没有黑市的国家”。⁴⁵

无论如何，黑市/自由市场/露天市场的存在，迫使每个人反省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

“粕取文化”

能使怯懦者壮胆、勇敢者疯狂的粕取烧酒，显然也使反体制倾向的艺术家变得多产。无论如何，它是那些对颓废和虚无主义大加礼赞的艺术家和作家们的特别之选。据说，这种劣酒最好捏住鼻子一口灌下。而一种混乱无序的亚文化圈“粕取文化”，更是由此得名。事实证明，“粕取文化”是妓女和黑市商贩们的世界的一种自然的补充。

粕取文化持续繁荣到1950年代，遗留下了可观的文化遗产——逃避现实的空想主义、性挑逗的刺激和赤裸裸的低级趣味。这是一个性导向的娱乐活动和泛滥的低俗杂志支配的商业世界。然而，正如妓女和黑市商贩那样，粕取文化的拥趸们，也表现出从权威和教条下解放出来，使人难忘的激情和活力。这种打破传统的氛围，由于酒吧知识分子的出现而更为强烈。这种知识分子有个诙谐的绰号，由日文词“粕取文化”和英文词“知识分子”混合而成，叫做“粕取分子”。粕取分子的写作宗旨，是强行赋予狂乱的颓废生活方式以所谓意义，乃至哲学意味。拜低俗杂志以及类似的严肃作家所赐，社会边缘的生活与如下理论纠缠在了一起：颓废是唯一的真诚和信仰，色情的肉体成了唯一值得崇拜的“体”。在某些这一类的理论公式中，性、颓废和“爱”简直就等同于“革命”。

低俗杂志是粕取文化最昙花一现的产物，最终通常成为所谓的“粕取杂志”。这个称谓本身就体现了反体制文化尖刻的幽默态度。粕取杂

志的说法，是一个巧妙的双关语，是说大部分这些早期刊物都很短命，就像喝粕取烧酒醉得那么快：三杯烧酒下肚，就会使饮者不省人事；同样，这些逃避现实的杂志很少有出够三期的。（在日文中，尽管“三杯”和“三期”的写法不同，发音却是一样的。由此产生了双关语“事不过三”。）在此之上，还有更重大的双层含义：当“粕取文化”赞扬一个享乐的，甚至是猎奇的、沉溺逃避的世界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唤起了对人生无常、朝不保夕、权威放逐、正统不再、绝对价值缺席的现实世界更为清醒的感知。⁴⁶

低俗读物的出版者，否认任何严肃的目的。他们的理念的经典阐述，刊登在一本名为《猎奇》的杂志的创刊号上。这本杂志的编者强调，他们没有“任何启蒙或教育读者诸贤的大胆野心”，相反只是想要给那些“努力建设和平国家而身心疲惫”的读者提供暂时的娱乐。粕取杂志的封面，通常是性感女人的特写，偶尔也有成双成对的情侣，绝大多数时候是白人。第一幅女性的半裸体照片，出现在1946年末的《赤与黑》月刊上。到第二年夏季，以裸体或半裸体女人的绘画做封面图案，就已经司空见惯了。

大部分占领军，通过他们的性经历来看待日本，而日本的年轻男性，则通过阅读低俗杂志来进行他们的性幻想。当几十万年轻的美国大兵，将随和友善的妓女看作是这个被征服国家的化身时，大批的日本男性，也正被怂恿着去想象西方的女性，将她们作为色情的对象。从这时起，理想化的、四肢修长身材丰满的西方女性形象，成为日本男人性冲动的对象，也成为年轻日本女性竭力效仿的目标。

这些低俗杂志的名目，通常像它们的封面设计一样五花八门。譬如，《猎奇》杂志引发了一系列的克隆读物，像《オール猎奇》（猎奇大观）、《性猎奇》，甚至《猎奇ゼミナール》（猎奇研究会）。借用甚至滥用英文做刊名的包括《オールロマンス》（*All Romance*，《罗曼司大全》）、《マダム》（*Madam*，《女士》）、《キャバレー》（*Cabaret*，《卡巴莱》）、《グロ》（*Grotesque*，《奇观》）、《Gメン》（*G-Men*，《侦探》）、《血とダイヤモンド》（*Blood and Diamonds*，《血与钻石》）、《ヴィナス》（*Venus*，《维纳斯》）、《スリル》（*Thrill*，《颤抖》）、《フーダニット》（*Who Dunit*，《谁是凶手》）、《ネオリベラル》（*Neoliberal*，《新自由主



“低俗杂志”：与反体制文化结缘的杂志引发了所谓色情、猎奇、荒诞的流行时尚的复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盛行一时。

义者》)、《ピンアップ》(Pinup, 《招贴画》)、《サロン》(Salon, 《沙龙》)和《ナンバーワン》(Number One, 《第一》)。《ナンバーワン》(Number One)是东京大学一些缺钱的学生们办的创收副业。以法文做刊名的有《シック》(Chic, 《新潮》), 德文的有《リーベ》(Liebe, 《爱》)。

还有一份刊物叫做《セッパン》(《接吻》), 在某些美国改革者都将接吻作为摆脱过去封建压抑的自由表达的年代, 这实在是一个完美的名目。低俗杂志的编者, 热忱欢迎这个天赐的特别礼物, 发表了诸如《キス回生论》(《接吻正名论》)之类的文章。然后就聚焦在那些试探占领军审查机关底线的题目上, 继续挑战当今时代的压抑。他们的确常常侥幸过关。一项基于对1600期“粕取”刊物的调查发现, 这类读物的“关键词”包括接吻、脱衣舞、内衣、“潘潘”和“有闲妇人”、贞节、近亲相奸、自慰行为以及寂寞的未亡人。这并没有什么启蒙意义, 但是无可否认, 它与直到不远的过去还在左右人们生活的为天皇出生入死的奥义大相径庭。⁴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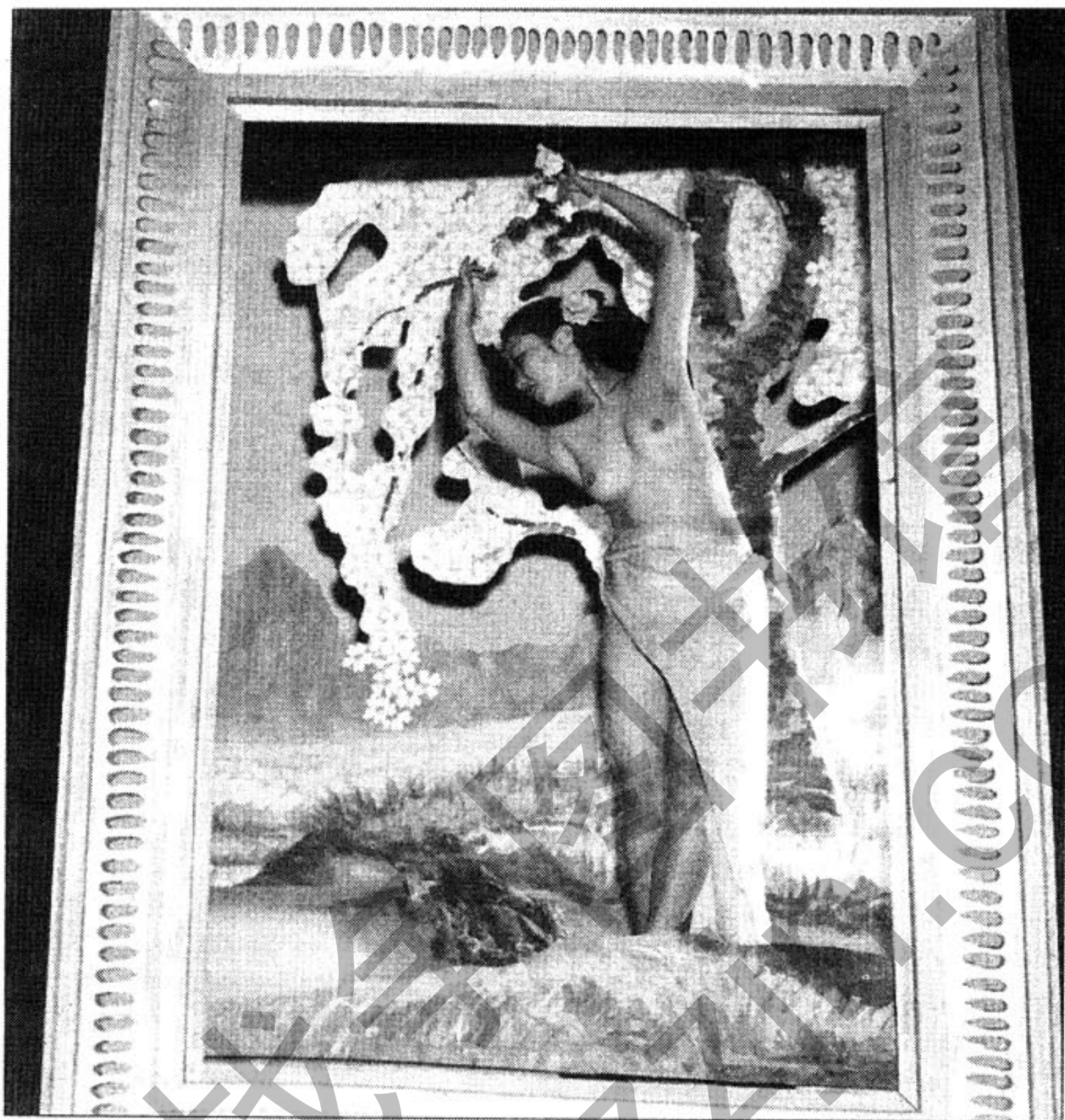
在被占领的日本, 在视觉影像上“为接吻正名”, 最初是经由好莱坞完成的。如由迪安娜·达宾(Deanna Durbin)主演的《春之序曲》(Prelude to Spring)和葛丽亚·嘉逊(Greer Garson)主演的《居里夫人》(Madame Curie)都大受欢迎, 部分原因是由于, 与投降前的惯例相反, 这些电影的接吻镜头未经删节。由于受到这种情形的鼓舞以及占领军的鼓励, 日本当地的电影工作室, 也开始斗胆在他们的作品中添加



更多的低俗杂志：甚至连女科学家（实际上是一位著名女演员）也成了“性问题专号”的封面女郎。

接吻镜头。第一个柏拉图式的吻，出现在大映映画的作品中。这部电影有个奇怪的名字《彼と彼女は行く》（《他与她行走》），于1946年4月中旬公映。此后又有匆匆一吻，出现在另一部大映作品《或る夜の接吻》（《黄昏的一吻》）中，上映于5月23日。翌日，当松竹工作室的《はたちの青春》（《二十岁的青春》）上映时，电影史真正被改写了。此片有一个男主人公亲吻女主角的特写镜头。着迷的观众们不知情的是，这瞬间的热情被进行了净化处理。银幕情侣在接吻时，悄悄地将一块浸透了消毒剂的纱布放在他们的唇间。男主角大阪志郎对于这一伟大事件的回忆，印象最深的就是消毒剂的味道。而女主角几野道子坚决宣称，她只是紧闭双眼完成任务而已。重要的电影杂志《キネマ旬报》（《电影旬报》）拘谨地评论说，就影片的情节发展而言，接吻是不必要的。尽管如此，形势发展已不容逆转。⁴⁸

此后，性商品化的多样性进展相对平稳。在这点上，1947年1月15日，有可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发生了两起象征性事件。一是，日本历史上首次西洋式选美比赛，因选出“银座小姐”而达到高潮。优胜者身高158厘米，体重50公斤，胸围和臀围分别是95厘米和88厘米。⁴⁹另一事件是，更具有想象力的改头换面的西式表演，“画框中的裸体”表演，于同一天在东京新宿开幕。这种表演的特殊之处在于，让女性摆好姿势站在巨大的仿制画框中静止不动，模仿著名的西方绘画作品。帘幕开启，模特们保持姿势数十秒钟，然后帘幕垂闭，以备模特展示下一幅西洋名画。



“画框中的裸体表演”，表面上是对西洋名画的复制，实际上协助开创了性商品化的战后文化。它是一位大学教授的创举。

“画框中的裸体”表演的发起人，是翻译歌德《浮士德》的桀骜不驯的德国文化研究者秦丰吉。而这次初演被优美地命名为“维纳斯的诞生”。据说，热爱西洋美术的男性观众排成了长龙，从表演舞台一直延伸到五层楼梯下的街道上。表演明星是一位颇具雕塑感的年轻的俄日混血女郎中村笑子，在胸前和腰际轻覆薄纱。第二位名声大噪的维纳斯甲斐美和，则真正半裸上阵。她不仅身材高挑，而且由于不同寻常的白皙肌肤而备受赞赏。尽管肤色白皙一直是日本旧时女性美的特征之一，是女性魅力的传统要素，但是现在看来，肤色白皙显然使人更接近白色人种。而身材高挑、胸部丰满则是女性美的新标准。

秦丰吉后来宣称，他采取凝固的表演方式，有其仁慈的初衷。他解 153



1947 年前，在东京浅草娱乐场所的美式脱衣舞表演，展示了“民主化”新的侧面。

释说，身材顾长的“维纳斯”十分罕见，而且他认为让腿短的女性跳舞，是不适宜和不讨人喜欢的。这话有些招人误解。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矮壮结实的合唱团女孩们，早就以其雀跃的舞姿登上了剧场舞台，而在高级旅馆和艺伎屋里，她们有时还脱衣解带，为男性客人表演更为放荡的舞蹈。无论如何，别的经营者并没有秦丰吉这样的骑士精神，很快脱衣舞表演以一出相当平淡乏味的名为《东京フォリーズ》（《东京罪恶》）的轻歌舞剧首演登场了。此剧的高潮是舞者摆好姿势，伸手到背后解开上衣。据说是由一位东京大学的学生引进了这一终场亮相。到 1948 年，更为通俗化的脱衣舞演出，在东京的浅草最富活力、最庶民化的“下町”娱乐场所出现。由浅草地区开始，脱衣舞向全国各地传播开来。

脱衣舞表演，正如它的前身“画框中的裸体”表演一样，创造出了新的明星。她们不仅成功风靡大众，而且迷住了日本一些最多才多艺、
154 最富创造力的艺术家。例如，浅草的一位脱衣舞明星松原“玛丽”，成了著名作家永井荷风的最爱。“玛丽”的超凡魅力，显然不仅仅来源于她舞台上的舞姿，还在于她不同寻常的经历。她毕业于一所有名的女子

高中，先前曾受雇担任国会贵族院（1947年前的国会上院）的秘书。另一位浅草明星志水敏子，被称为日本的“吉卜赛玫瑰”，因美国最为著名的脱衣舞女“吉卜赛玫瑰李”（Gypsy Rose Lee）而得名。“吉卜赛玫瑰”志水敏子几乎完全是因为她的“白种人”特征而受到崇拜：有诱惑力的肉体和有魅力的个性。对于多产的木版画家栋方志功而言，她有着“像女神一样的胴体”。西洋油画家小野泽发现，酒馆里的歌舞表演、轻歌舞剧以及脱衣舞等整个粕取文化的环境，最能激发他的灵感。就像图卢兹—洛特雷克（Toulouse-Lautrec）一般，这些风尘女子成了他艺术的主要题材。⁵⁰

然而“粕取”反主流文化，尽管显而易见有借用自西方的元素，但是其根基是本土的。正如黑市一般，这是个征服者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进入的世界。这个世界像低俗杂志的封面一样花哨煽情；也像黑白照片拍摄的那些酒吧、舞厅、肮脏的小酒馆、狭窄弯曲的小巷、混乱的后台更衣室一样具有粗糙的质感。征服者的想法对这个世界几乎毫无影响，这个世界在闪耀夺目的美国大众文化潮流中载沉载浮。离开好莱坞与大众流行音乐，“美国”通常只是意味着一支无组织的外国占领军而已，暧昧地在场，以其自身作为日本没落的最终象征。同样，尽管酒吧间知识分子常常欣喜于从欧洲知识分子传统那里引进名词和术语，但是这些名词术语，时常只是像异国的残骸和漂流物一样漂浮在自我放纵的海洋上。例如 *apure* 这个词，是法语词 *après-guerre*（战后派）的缩写，起初指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小撮年轻的存在主义者和虚无主义作家，他们认为战争劫难包含了所有的绝对价值。然而不久之后，“*apure*”这个词，开始不加区别地指代任何反抗传统行为规范的青年人。反传统文化来自于内部。

颓废与真实性

放荡与色情在许多层次上皆有所表现。像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这样的大家，在战时受到书报审查制度的压制，战后却成了官能描写的行家里手。处于“文化人”中高尚阶层的其他作家，也开始将个人情感描写放在优先位置。古典诗人川田顺，由于在68岁高龄夺走了自己弟子的年轻妻子而名声远播。他在一首诗中如此咏哦自己的热情：“行将就



坂口安吾 1946 年的评论《堕落论》，作为对战后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所信奉的传统价值的最为简洁的批判宣言，时常被引用。这张林忠彦拍摄的照片，其风格颇能体现出坂口混乱与破坏的天分。

木的老人，恋爱无所畏惧。”而他也确实有艳福，与自己抢来的恋人又亲密交往了近 20 年光景。⁵¹

当这些文学上的爱情、性欲表现，与粕取文化的淫荡色情倾向产生共鸣之时，三位更为年轻的作家——坂口安吾、田村泰次郎和太宰治，戏剧性地将堕落颓废和性爱行为与真实性和个人主义问题联系了起来。坂口安吾发表于 1946 年 4 月的评论《堕落论》，对战时体验的“幻影的”本质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将它与战后社会强烈的人性的、真实的颓废做了鲜明对照。坂口的公众形象，正如他的主张一样狂暴放荡而无秩序。在投降后的岁月里，他一直服用肾上腺素和其他各式兴奋剂，并且

156 在几张难忘的照片中为后代子孙留下了他的影像。在这些照片中，坂口坐在矮几旁，几乎完全埋在由旧报纸、书籍、杂志、揉皱的手稿、空烟盒、撕掉的信封以及皱巴巴的毛巾或毯子制造的垃圾之中。他身上反穿着一件汗津津的背心，撅着嘴，眼光越过反光的角质眼镜，悲哀地凝视

着照相机镜头。他在写作——当然几乎都是关于堕落的主题。⁵²

堕落是坂口的专业；而且，在某些评论家看来，他有关堕落的随笔抓住了时代的本质，正如日本漫长历史上任何经典文本一样光辉灿烂。依照后来评论家的说法，“《堕落论》将人民从战争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回归合理的自我，并给予他们生活的信心”。⁵³ 坂口的吸引力，部分来源于这样的事实：他坦承战争的心理魅力——巨大的破坏具有的催眠般的庄严肃穆和人民顺从命运的“奇妙之美”。然后，他又以同样激情的文字对此进行批判。正是在《堕落论》中，坂口指责说，先前矢志像散落的樱花般牺牲的神风特攻队飞行员，现在做起了黑市买卖；那些英勇地送丈夫上前线流血牺牲，然后跪在他们的牌位前祈祷的妻子们，其实早就在物色其他的男人了。他宣布，“自战败以来，这个国家的面貌就是纯粹单一的堕落”，而在此之中，孕育着真实、真正人性的回归：

与堕落的平凡相比，与它平凡的当然相比，人们顺从命运之美，伟大的破坏中的爱情之美，只不过是像泡沫一样空虚的幻影……

我们难道不应该承认神风特攻队的英雄只是个幻影，而人性的历史开始于他着手经营黑市生意的一霎。难道我们不应该承认那些献身道义的未亡人只不过是幻影，而人性的历史开始于一张新面孔扑入她怀中的一刻。或许天皇也不过是个幻影，天皇真实的历史始于他成为凡人的瞬间……

日本被打败了，武士道消亡了，但是人性从堕落、真实的母体中孕育诞生了……

人性不会改变。我们只不过是回归人性。人堕落了。义士和圣女堕落了。这个进程不可能终止，而终止这个进程就不可能拯救人性。人活着，只有堕落。除此之外，没有捷径能够拯救人性。⁵⁴

这段批评的冲击力主要在于，它看上去如此单纯而正常。尽管“健康”和“健全”是战争年代的理论家和审查官们非常看重的词汇，但是当时以此为标榜的世界，事实上却是病态的。相反，颓废和不道德是真实的、现实的，是至高无上的人性。只有从对待堕落的谦虚态度开始，

人们才能憧憬新的，更名副其实的道德。坂口的结论是，“我们必须以我们的最大能力，发现自我，并且拯救自我”。只有这样做，每个人才能够产生他自己的“武士道”、“天皇制”。坂口以其特殊的方式，确认了道德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反复衡量的问题：建立在真正的主体性——一个人的真正的“主观性”或“自律性”之上的社会，有助于对抗国家权力对民众的教化。⁵⁵

田村泰次郎的作品，则使得坂口的思考更加血肉丰满。田村在中国作战7年，对自己祖国“圣战”造成的恐怖现实不抱什么幻想。1946年下半年开始，田村出版了一系列小说和随笔，与抽象“思想”、“观念”的妄想性相对照，颂扬肉体的真实性与可信赖性。其中最引起轰动的作品是小说《肉体之门》。小说的题目成了当时流行的警句，而这部作品也被改编成了戏剧长期上演，于1947年在东京初次登台演出，翌年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

通过颂扬肉体，田村以语言进行了强烈的体制破坏行为，因为他所选择的语言等于是亵渎，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犯上。自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所有的日本人都被教化相信最高的敬意对象是国体，或曰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是以两个汉字“国”和“体”书写的神秘观念。自1920年代中期以来，对于国体进行批评是一项重大犯罪。颂扬肉体，而且像田村写得那么具有诱惑力，简直就是批判“国体”，完全是本末倒置崇拜起“体”（肉体）来了。现在唯一值得崇拜的“体”成了“肉体”，个人感官的肉体。抽象的“国体”或者国家没有意义，而有关的一切爱国的废话，都是口是心非。重要的是，只有个人的孤独的肉体，才是毋庸置疑的真实的、可信赖的和根本的。田村解释说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被所谓长期的精神理念传统压抑损害了肉体的民族，“肉体之门”就是“近代性之门”。⁵⁶

由于追随田村肉体论的先见性，产生了所谓“肉体小说”的整个流派。但是即使田村不凡的声望，也没有超越魅力非凡、悲剧性命运的同仁太宰治。太宰治的生活、工作，甚至他的死亡，都是粕取文化迷人堕落的缩影。与坂口安吾一样，他也留下了一些生动的照片。一张照片抓拍到他有代表性的姿态：他坐在两个而不是一个酒吧凳上，袖子凌乱地卷起，领带松开，手上拿着香烟，后裤袋里半露出一本杂志。他长相

俊美，而且易于想见，在他从凳子上掉下来之前，他的谈话必定也是机智诙谐、妙语如珠。⁵⁷

太宰治出生于优裕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战败之前很久，就开始踏上了通过自我放纵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他是在“虚脱”状态被确认为一种集体症状之前，就已经疲惫绝望的那些岁月的一个例证。他甚至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就染上了毒瘾，而且看起来长期追求并培养那种自我毁灭的艺术家的神秘。太宰治个人的恶魔性，看来成了战后时代混乱与颓废的象征。天赋极佳而又苦恼透顶，他生活得像个堕落者，然而经常写作起来却又像是个天使。他1947年发表的小说《斜阳》，哀叹真正的贵族阶级的消亡，并公开声称要在“爱与革命”的主张中寻找时代的哲学。小说出版一年后，酩酊大醉的太宰治与他的情妇在玉川上水投水自杀，以此作为无所依傍的世界的悲剧象征，成就了自己的不朽。⁵⁸



159

太宰治在完成小说《斜阳》不久，就在1948年跟他的情妇双双自杀。而《斜阳》却作为战后初期混乱、堕落和不安的浪漫主义难忘的象征，继续长久地流传着。

《斜阳》是一部缺陷很多而且有欠均衡的小说。它不时陷入感伤的浪漫主义，并且处处点缀着“柏取知识分子”们惯用的空洞的欧式术语和引文。尽管如此，它几乎一发表就立即成为经典，这不仅是因为它描写的颓废和自杀呼应了著者颓废和自杀的事实而已。没有作品像它一样，如此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失望感与梦想。无论他欠缺什么，太宰治并不欠缺自怜的感觉，这种自艾自怜与当时社会上弥漫的深深的被害者意识，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同时，他发现了没落和隐私之美，尽管柔弱无力，却有可能经由爱超越绝望。尽管是以太宰治式的特有的术语加以表达，这种“爱与革命”的愿景还是使公众产生了共鸣。

在《斜阳》中，“爱与革命”的信条，不是由与太宰治本人十分相似的、年轻的、具有自杀倾向的艺术家身份的弟弟，而是由他的姐姐和子明确说出来的。像她的弟弟一样，和子拒绝像社会要求的那样盲目顺从地生活。然而，与太宰治不同的是，和子决心活下去而非死亡，接受这一点意味着她自己必须与“这个世界进行斗争”的事实。在《斜阳》著名的一节中，和子说过这样的话：

我从未渴望过革命，甚至对爱也一无所知。直到现在，我们的长辈还在教导我们，革命和爱是最愚蠢、可鄙的事情。在战争之前和战争中，我们相信情况就是那样。但是在战败之后，我们变得不再信赖我们的长辈们，而且开始感到生活的真正道路，就存在于他们所反对的事物之中。我们开始相信革命与爱，实际上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事，而且正因为它们如此美妙，长辈们才顽固地撒谎说它们是酸葡萄。我确信这一点。人是为爱与革命而生。⁵⁹

尽管太宰治曾偶尔涉足左翼活动，但是他对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或更为自由的“民主革命”议程都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在《斜阳》之后的小说《人间失格》中，他无情地奚落了正统的左翼运动。太宰治的半自传体小说的主人公断言，单纯以经济原因很难充分解释人类的行为。他只不过是觉得不合法的左翼圈子的氛围，比“合法的绅士世界”更让人舒服而已。⁶⁰

他对于美国占领日本的态度也同样刻薄。当美国人的形象在太宰治

的作品中出现时，通常只不过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边缘的存在。偶尔，譬如在小说《冬的花火》中，他吐露出更深的爱国的愤慨。尽管占领军的审查官删除了文本中的过激言辞，且请看下面一段出自女性之口的话（括号中是被删掉的部分）：

我们说战败了，战败了，但我并不认为是那样。我们是被摧毁了，消灭了。（在每一个角落，日本国都被占领了，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俘虏。）那些没有发现这可耻的乡下人的都是傻瓜……

在审查过后的三个月，太宰治悄悄将下面这首含蓄的反美短诗，加进了短剧《春の枯叶》中，算是尝到了一点复仇的乐趣：

不是你
不是你
我们期待的
可不是你。

在随后的作品中，他又掺进了“从此在日本，甚至连马和狗也都男女同权了”的句子。⁶¹

既然太宰治同时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美国式的激进变革，与此相应，那么他在《斜阳》中提出的“革命”图景，当然就非常独特。小说结尾，他的女主人公和子以其散漫的方式宣布，革命只不过是破坏“旧道德”的反抗的爱，一种超越理解的激情，甚或是从这种激情中衍生出来的悲哀。革命和爱是一回事。对于和子而言，革命就意味着，为她那声名狼藉的、有点上了年纪的恋人，生养他们的私生子。她在小说末尾的信中宣称，“那将是我道德革命的完成”。⁶²

这并非是每个人都适用的革命信条，太宰治也没有自命如此。毕竟，他不是出于政治目的，只不过是在表达情感，正如他的作品所显露的那样：一种受害者意识困扰下的情感。这是小说显而易见的主题。和子自杀的弟弟，是人生“小小的牺牲品”。她的邈邈、酒精中毒的情人，有着“牺牲者的面容。一个高贵的牺牲品”，而她自己绝大部分时间是

在唠叨“活着的极度悲哀”。事实上，小说结束于一封令人吃惊的信函，那是和子写给她那软弱无力的爱人的。在信中她将革命视同于牺牲，而把牺牲与美等同起来：

一个私生子和他的母亲。

无论如何，我们打算与旧的道德斗争到底，而像太阳一样生活下去。

请你，也继续你的战斗吧。

革命仍然压根儿也没有发生。看来需要更多、更多珍贵的牺牲者。

现在的世界中，最美好的事物就是牺牲者。⁶³

这个段落不仅感伤脆弱、自作多情，而且使人联想起战争年代，那些赞美为了伟大目标而倒下的牺牲者之美的论调。正如太宰治的许多其他作品一样，这部著名的小说，揭示了“新”、“旧”日本之间痛苦、扭曲的关联。

许多评论者震惊于受大众欢迎的作家，如太宰治、坂口安吾和田村泰次郎等人在文学上的发展。批评家河上彻太郎，猛烈攻击《斜阳》是一部颓废的作家描写颓废的人物而吸引颓废的读者的小说。⁶⁴ 坂口安吾对战争强制性的热情，导致批评家们抨击他是肯定暴力。田村泰次郎的《肉体之门》，有关屠杀公牛和折磨妓女场面的逼真描绘，也同样受到了批判，据说是因为表现了与战时的暴行并没有本质区别的暴力的诱惑。在1949年发表的一篇文笔流畅且高度思辨的文章中，政治学者丸山真男不仅设法论证，“肉体文学”与战争年代的异常出版物和以前执著于肉体性的“私小说”同质，而且认为“肉体”文学与当时物欲横流的“肉体”政治的破产是一回事。丸山评述说，尽管肉体文学可能看起来“肆无忌惮地”夸张人生的污秽，“实际上不过是对平凡世界真实彻底的发掘而已”。在丸山看来，这种状况是不祥的征兆。他总结说，“如果我们不想方设法控制肉体文学和肉体政治，那么谈论作为民主和文化国家的日本就是无意义的”。⁶⁵ 在占领期行将结束时的1952年，德高望重的文艺评论家中村光夫，对肉体文学的评价也有这样的倾向。他宣称自战败

以来，日本尚未产生任何独创性或有价值的文学。⁶⁶

中村这种意气用事的评价令人怀疑。因为，无论其文学评价若何，这些写作逃避现实的小说和肉体文学的作家们，这些“颓废”的传道者和肉体的哲学家们，这些软弱的爱与革命的浪漫梦想者们，这些 *après-guerre*（战后派）的存在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们，的确激发了大众的意识，而且以那些持批判态度的批评家们难以企及的方式，对教条的思维方式发出了质疑。他们充满活力、打破传统，而且相当有影响力，尽管学院派的精英们不愿承认这一点。他们可能尚未构成日本真正革命性变革的基础，但是他们对于旧的价值观念的挑战，实在是令人难以忘怀。

“婚姻生活”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肉体”只是一个文学方面的概念。另一方面，性欲却不是。对夫妻间肉体关系进行重新审视的主流趋势，并未导致像粕取文化对“健全”的肉体关系的嘲讽和奚落，而是导致了对结婚对象之间“健康的”肉体关系的重新思考。古代日本的诗和散文，讴歌男女之间相互平等分享性爱喜悦的理想。然而，在中世纪的封建时代，封建统治阶层逐渐在爱情和婚姻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性的快乐与婚姻之间也同样如此。“良家”妇女被教导她们天生就比男人卑下；她们整个人生就是要服从于三代的男性家长（少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尽管男人们有性欲可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同样的欲望和行为，对于有教养的妇女来说是绝对不合适的。现代国家的理论家们，将这些封建时代的规范重新进行了仔细的编排，作为“现代”夫妇的行为准则。在夫妇间尊卑关系的私人世界里，女人至今仍背负着更为沉重的负担。女人的宿命就是要成为“贤妻良母”。她最大的义务是侍奉男性支配的家庭。同理，家庭的义务，则是为天皇的国家奉仕。

163

毫无疑问，尊重夫妻关系中真正的互惠，不仅包括“爱情”，而且还包括相互的性满足，成了反抗既定权威，并且提升个人情感与个人生活地位的一种方式。战后初期，这种观念开始以各种面目出现，包括大量的大众出版物，不仅强调性交的乐趣的正当性，而且注重获得性交乐趣的适当技巧。粕取杂志及时地将提升性满足的“婚姻生活”话题，确立为一种独特的商业化的文艺类型。然而，这种发展倾向的推动力，竟

然来自于一本有关结婚生活的严肃书籍的广受欢迎。此书登上了1946年十大畅销书的排行榜，并且盘踞了一年多之久。

这一令人惊诧的出版现象，是一本名为《完全なる结婚》（《完整的婚姻》）的书。它是一本翻译作品，原作是在1926年以德文出版的一本临床医学手册，由一位德国产科医生T.H. 范·德·威尔德（Van de Velde）所作。这部大作的一部分，实际上曾在1930年以《完全なる夫妇》（《完整的夫妻》）的题目译成了日文。它的首位翻译者是一位共产主义者，首次的出版者是粗制滥造色情书籍的出版社。而这本书很快就以“不健全”为理由，被战前的检查机关禁售了。尽管此书被禁，但是它作为一本“性解放”著作的声望，却在左翼知识分子中保留下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这本书的德文版和英文版，也在医学院的学生和年轻医生中间广为流传。

战后《朝日新闻》的一次读者调查，询问是否有人会对此种书籍感兴趣，引发了一天之内一百多人的回应。此后，范·德·威尔德的著作的完整版，被一群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学生们重新翻译出来。据一位翻译者的回忆，大学生们抽签决定谁负责翻译有关性技巧的露骨章节。随后一种廉价的、更通俗的删节本出现了，很快跃升到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三位。

毋庸置疑，许多读者受《完全なる结婚》的吸引，是因为它战前“性书”的名声，由于它此前的被禁而增加了诱惑力。这本书是范·德·威尔德的第一本著作，执笔于他50出头，有了20年从医经验之时。此书的预期读者，主要是医学从业者，以及有教养的已婚男士。它的一个基本前提，在当时是非常开明的，即“性是婚姻的基础”。这本书对日本人性意识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引起了对于尤其是女性的“性感曲线”的注意，并强调了前戏、后戏和性高潮的概念与实践。范·德·威尔德的在性交中“男人是老师”的观念，在今天看来可能已经落伍，但是他对于女性在夫妻生活中的性交感受和性欲的敏锐理解，直到近年仍然看起来令人震惊。⁶⁷

1949年，大众对于婚姻性生活进行坦率讨论的需求，被一本新月刊《夫妇生活》开发利用了。这本杂志的创刊号，成了出版业传奇性的范例。首印7万册当日售罄。第二次印刷的两万册，也很快被抢购一空。

那一批杂志赶制得如此匆忙，以至于有许多本只是在封面的空白背景上印上了杂志的名称而已，从而成了收藏爱好者们的珍藏。这通常是集邮者才有的癖好。《夫妇生活》月刊很快达到每期印刷3万册。它的成功引起了如此的轰动，据有的说法，它标志着“粕取杂志”时代的终结与新的大规模出版时代的到来。尽管《夫妇生活》相当部分的文章还是致力于露骨的性技巧的探讨，但是它与先前的低俗色情出版物有了本质的不同。通过将性交与婚姻联系起来，《夫妇生活》使性交成为一种正当行为而不再是偷偷摸摸的活动，而且将男女间的尊重互利和共享性爱乐趣，变成了两性平等的象征。⁶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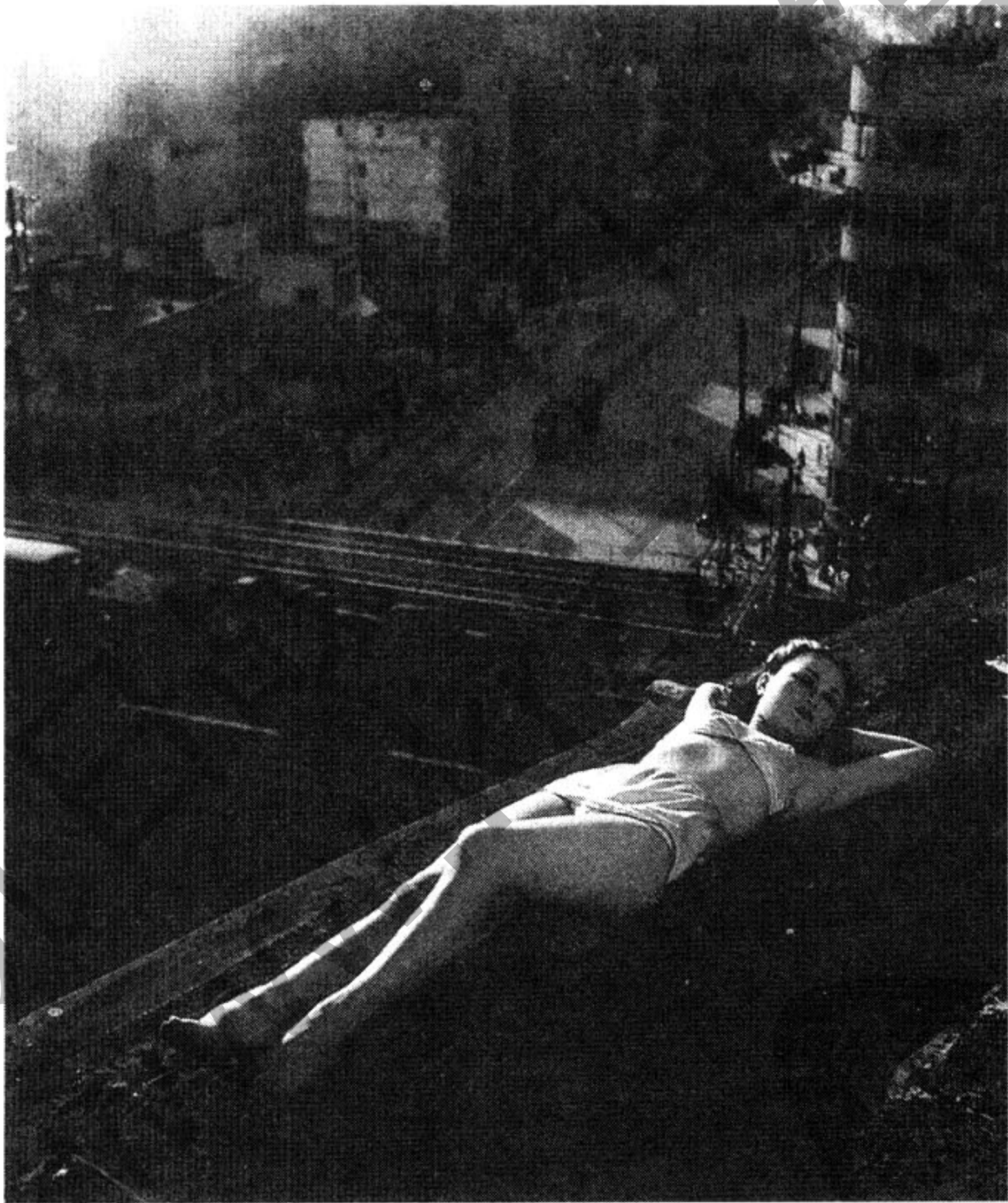
《夫妇生活》的出版者参考借鉴了《性科学》等美国杂志作为范本，但是他们并非是在日本开拓全新的领域。早在1933年，一本由著名作家菊池宽坐镇的战前杂志《话》，即开始尝试介绍有关性爱实践方面的严肃文章。《夫妇生活》本质上是对战前《话》杂志不成功尝试的复兴，因而也吸收改造了一些与刚刚过去的年代相仿的论调。正因如此，这本新杂志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听起来与理论家们常年倡导的父权式的“家庭制度”与“家族国家”酷似。然而，通过确认夫妻间和谐互利的性关系对于家庭的必要性，这本杂志也破坏削弱了旧的意识形态。正如在战败后的日本将会一再发生的那样，言语词汇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它们的意味却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

从《夫妇生活》的读者通信栏可以看到，与低俗的色情杂志不同，这本新刊物也吸引了与男性读者同样多的女性读者。尽管在创办初期，¹⁶⁵《夫妇生活》收到了许多批评信件——据一位编辑回忆，尤其是来自“知识界”的批判——但是大批表示支持的信件像潮水般涌来，既来自已婚男士也来自已婚妇女。这些信件还透露了一个讯息，正如其他各国的人们一样，很多日本人被性功能不全的担忧所困扰。男性读者最普遍的两种焦虑是性器短小和早泄问题，而女性咨询最多的问题是能否进行缩阴手术。

尽管创刊目的是严肃的，但是事实证明，《夫妇生活》很容易受到粕取杂志病态的影响。认真和煽情之间的界限很快就模糊不清了，单纯的性爱描写逐渐增加，取代了对性爱互利和婚姻幸福的身心两方面复杂性问题的真诚探讨。与此同时，《夫妇生活》的成功，激发了大批跟风

刊物的诞生，它们并未对此种类型的杂志的实质有何增益，只不过确实强化了渴望夫妇间深入的肉体关系的公众意识。报摊上充斥着标题和内容看起来与新婚夫妇浪漫的生活前景，以及具体的日常生活本身相关的刊物。代表性的杂志包括《夫妇日记》、《摩登夫妇生活》（《摩登夫妇生活》）、《夫妇世界》、《新夫妇》、《夫妇的寝室》、《夫妇的性典》、《完全なる夫妇生活の友》（《完整的夫妻生活之友》）、《爱情生活》以及《ロマンス生活》（《浪漫生活》）等。⁶⁹

166



林忠彦拍摄的一张关于“粕取文化”的照片。照片中的年轻女性身着白色泳装，横陈在高高护栏上，身下是东京破败的街市。这张照片巧妙地捕捉到了战败的文化气氛。

探讨严肃问题与逃避现实之间界限的模糊，总体而言是粕取文化的典型特征。对此，一些批评家尤其是左翼批评家提供了一种阴谋说的阐释。他们认为，“性”是受到占领军当局和保守派政客鼓励的，是用来转移民众不满、转移他们对于真正激进的政治变革与抗议运动的能量的、更为广泛的“三S”政策的一部分，而其他两个“S”则分别是指“体育”和“银幕”，因为无论国产还是进口的电影都具有逃避现实的本质。⁷⁰ 依据严峻的阴谋说的解释，性的商业化已被默许（如果不说是鼓励的话），就像体育赛事和电影一样，被当作是受到饥饿和困乏、混乱和绝望困扰的社会的有效的安全阀门。在一些人看来是革命性的反主流文化，却被另一些人认为是反革命的阴谋。

阴谋说的解释，的确不同寻常地刺耳、自负，带有精英主义以及被迫害妄想狂的意味。对于粕取文化更为不朽的评价，可以在林忠彦 1947 年拍摄的一幅照片中获得。照片中是一位身着白色两件套泳装的模特，横陈在高悬于肮脏的火车铁轨与污黑的城市街道之上的脏污护栏上。时代的苦难显而易见，但同时还有超越苦难的乐观精神，幽默的、简直是挑战般的锐气。这张照片机智而悲哀，既写实又做作，既色情又不可思议地纯洁。数十年后，它仍然是一幅战败文化的难忘的肖像，它所排除在外的和它所描绘的同样都值得纪念。我们看到这里没有美国人，没有民主说教的政治家，没有穿军装的人物，没有怀旧的迹象，没有国家权力的痕迹，有的只是在这战败的国土一隅，苦乐参半的生活氛围。⁷¹

注释：

- 1 典型的例子，参见 1994 年 8 月 14 日《朝日新闻》的读者来信；讲谈社编《昭和・二万日の全记录》（东京：讲谈社，1989），第 7 卷，p. 128；此文献下引为 SNVZ。
- 2 安田常雄《记忆という自由》，《思想の科学》130 号，1990 年 7 月，p. 7。
- 3 流行用语“第三国人”，本身就反映出战后日本值得关注的种族歧视倾向。“外人”是通常对“外国人”的称谓，主要指白人，轻蔑意味较少。“第三国人”主要是指日本人以外的亚洲人，尤其是朝鲜人和台湾人。“第三国人”被认为是第三等人，地位处在日本人和第二等的白人之下。
- 4 《每日新闻》1946 年 9 月 29 日；鹰桥信夫《昭和世相流行语词典》（东京：旺文社，1986）引用，p. 111。
- 5 文艺春秋社编《〈文艺春秋〉に見る昭和史》（东京：文艺春秋，1982），第 2 卷，pp. 59 - 62；此文献下引为 SSS。

- 6 栗屋宪太郎编，《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二卷 战败直後の政治と社会》（东京：大月书店，1980），pp. 219 - 220。亦可参见 Michihiko Hachiya（蜂谷道彦）著，Warner Wells 译，*Hiroshima Diary: The Journal of a Japanese Physician, August 6-September 30, 1945*（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5, 1995），p. 194。
- 7 关于战后日本的卖春问题最重要的文献，是神崎清的《卖春・决定版神崎レポート》（东京：现代史出版会，1974）。尤可参阅此书 pp. 127 - 162，以及卷末详尽的年表；在使用这部颇具价值的“报告”中的某些数据时，则须慎重对待。此处论述还参照了以下文献：吉见周子《卖娼の社会史》（东京：雄山阁，1992），pp. 185 - 215；西清子《占领下の日本妇人政策》（东京：ドメス出版，1985），pp. 34 - 39；SNNZ 7: 270 - 271, 313 - 316；矶田光一《战后史の空间》（东京：新潮选书，1983），pp. 51 - 55；东京烧迹闇市を记录する会编《东京闇市兴亡史》（东京：草风社，1978），pp. 192 - 217, 218 - 234。此文献下引为 TYKS。
- 8 前引《东京闇市兴亡史》，pp. 196 - 199；吉见周子《卖娼の社会史》，pp. 185 - 188, 197 - 198；神崎清《卖春・决定版神崎レポート》，pp. 131 - 133。池田勇人，后来在占领时期担任大藏相，1960 - 1964 年出任首相，提出日本的所得倍增计划。本文有关池田的记述，参见《サンデー毎日》1949 年 9 月 1 日号。
- 9 吉见《卖娼の社会史》，p. 189。
- 10 《东京闇市兴亡史》，pp. 200 - 201。
- 11 吉见《卖娼の社会史》，p. 188；西清子《占领下の日本妇人政策》，p. 36。
- 12 神崎《卖春・决定版神崎レポート》，pp. 136 - 138；吉见《卖娼の社会史》，pp. 193 - 194。
- 13 《东京闇市兴亡史》，pp. 205 - 208；高见顺日记的摘引，参见矶田光一《战后史の空间》，pp. 51 - 52。
- 14 住本利男《占领秘录》（东京：毎日新闻社，1952），第 1 卷，pp. 67 - 68。
- 15 《东京闇市兴亡史》，pp. 207 - 208；SNNZ 7: 270 - 271。
- 16 据统计，在 RAA 营运期间，每天约有 40 起针对日本女性的强奸和暴行，1946 年初当 RAA 关闭之后，这一数字上升到平均每天 330 起；吉见《卖娼の社会史》，p. 198。亦参见福岛铸郎《战后杂志发掘》（东京：洋泉社，1985），pp. 125 - 126。对澳大利亚占领军在广岛强奸和暴行的真实记录，参见 Allan S. Clifton, *Time of Eallen Blossoms*（London: Cassell, 1950），第 20 章。
- 17 SNNZ 7: 270 - 271；吉见周子《卖娼の社会史》，pp. 196 - 197, 210 - 212；神崎清《卖春・决定版神崎レポート》，pp. 384 - 386；鹰桥信夫《昭和世相流行语词典》，p. 226；住本利男《占领秘录》，p. 67。
- 18 《东京闇市兴亡史》，pp. 212 - 216；矶田光一《战后史の空间》，p. 52。
- 19 SNNZ 7: 270。占领期间卖春妇罹患性病的比例，估计为 30% - 60%。
- 20 SNNZ 7: 270 - 271, 325；吉见《卖娼の社会史》，p. 198；TYKS, p. 85；SSS, p. 223。对卖春妇数量的保守估计，据《朝日年鉴》1947 年版的数据，1946 年为 16000 人，p. 281；神崎清《卖春・决定版神崎レポート》的统计，1948 年达到 38840 人，p. 386。
- 21 SNNZ 7: 271；TYKS, p. 320。1948 年 12 月，一名男妓袭击了亲自调查东京上野地

- 区卖淫事件的东京警察署长，引起关注，参见神崎清《卖春・决定版神崎レポート》，p. 386。男妓问题乃至日本人与占领军人员之间的同性性关系问题，仍有待研究。
- 22 VAN, 1947 年 12 月号。收入《战后体验》（东京：河出书房，1981；人生读本シリーズ），p. 67。
- 23 对这种新的纵欲，尤其是电影表现的女权主义分析，参见 Joanne Izbicki, “The Shape of Freedom: The Female Body in Post-Surrender Japanese Cinema”, *U. S. -Japan Women's Journal; English Supplement* 12 (1997), pp. 109 - 153。
- 24 SSS, pp. 223 - 229; TYKS, p. 223; 《朝日年鉴》1947 年版, p. 281; 吉见《卖娼的社会史》，p. 210。1947 年 5 月的东京大搜捕中，约有 5225 名妓女被捕。其中 2450 人供述卖淫原因为“生活困苦”，另有 1263 人爽快地承认是出于“好奇”。
- 25 《战后体验》（人生读本シリーズ），pp. 60 - 61；另一妓女的供述，见 pp. 61 - 63。
- 26 SNZ 7: 301。
- 27 这是《读卖新闻》记者末次摄子的评论，收入读卖新闻大阪社会部编《终战前后》（东京：角川书店，1984），p. 114。
- 28 住本《占领秘录》，第 1 卷，p. 70。这部两卷本的占领“秘史”出版于 1952 年，是对美军占领期间无法公开谈论的事实的大披露，在当时十分著名。据记者住本利男估算，占领军人员的个人消费总数约 18500 万美元，其中“几乎半数”通过各种渠道到了潘潘们手中。
- 29 “从边缘开始的”西化说法的提出，参见 TYKS, p. 242。
- 30 前引《占领秘录》，第 1 卷，pp. 70 - 72。
- 31 《漫画》1948 年 5 月号。
- 32 对黑市最真实生动的研究著作是《东京闇市兴亡史》。黑市情形的概括，参见 SNZ 7: 282 - 284。黑市暗语“ショバ代”，见读卖新闻社《终战前后》，p. 138。
- 33 朝日新闻社编《声》（东京：朝日文库，1984），第 1 卷，p. 19；亦参见同书中 8 月 15 日来信，pp. 25 - 26。
- 34 TYKS, pp. 15 - 17。
- 35 前引之读卖新闻社《终战前后》，p. 134。
- 36 SNZ 7: 155, 282 - 284; TYKS, pp. 15 - 22。
- 37 读卖新闻社《终战前后》，p. 132, 137 - 139。
- 38 此处对松田组活动的概述，是依据一份 1946 年的报告，收录于《战后体验》，pp. 75 - 79。
- 39 SNZ 7: 279, 283 - 284。1946 年初，估计约有 16000 名“第三国人”从事非法的黑市交易，其中绝大多数是朝鲜人和台湾人。“涉谷事件”也使得对这些亚洲侨民的司法处置问题成为国际争端（中国主张对在日居留台湾人的管辖权，对此台湾人亦表示认可，同时日本政府也试图行使其管辖权）。参见“Problems Regarding the Treatment of Formosans in Japan Raised by the Shibuya Incident”, *O. S. S. /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Reports, II; Postwar Japan, Korea, and Southeast Asia* (Washington, D. C. : Microfilm Project of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7), reel 4, document 6。
- 40 《终战前后》，pp. 135 - 136。

- 41 《终战前后》，pp. 134, 140 – 146。
- 42 *TYKS*, pp. 52.
- 43 *SSS*, p. 63; 《声》第1卷, pp. 175, 221, 292。
- 44 *TYKS*, pp. 20 – 22, 33, 93 – 94, 251 – 254。猪野健治尤其强调，黑市反映出了自由解放的基本状态。
- 45 《声》第1卷, pp. 275 – 277。
- 46 在1946年被称为“粕取（カストリ）杂志”之前，战后的低俗刊物也被称作“ピンク杂志”（桃色杂志）或“エログロ杂志”。“エログロ杂志”的称谓，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流行的颓废的“エログロナンセンス”文化有关。“エログロナンセンス”一词，其实就是英文单词 *erotic*（色情）、*grotesque*（猎奇）和 *nonsense*（无意义）缩写的日文发音。战败后的颓废显然有其战前的根源。对败战后杂志的基本梳理，参见福岛铸郎《战后杂志发掘——焦土时代の精神》（东京：洋泉社，1985年）。此处对粕取杂志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福岛前引书（尤其是 p. 163 之后的行文）；1967年12月《历史公论》特别号上《カストリ杂志文化》一文，pp. 40 – 47；以及 *SNNZ* 8: 1 – 3, 36 – 37。既然“粕取”一词的字面意思是指日本米酒的酒糟，从中酿制提取劣质的“粕取烧酎”，因而英语世界的学者有时也将与之相关联的反主流文化与低俗杂志称为“the dregs”（渣滓，糟粕）。
- 47 前引论文《カストリ杂志文化》，p. 42；关于杂志主题更多类型的探讨，参见福岛铸郎《战后杂志发掘》，p. 190。
- 48 Kyoko Hirano（平野其余子），*Mr. Smith Goes to Tokyo: The Japanese Cinema und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1945 – 1952*（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2），pp. 154 – 165；*TYKS*, pp. 155 – 156；*SNNZ* 7: 257。
- 49 *SNNZ* 8: 34。
- 50 *SNNZ* 8: 38 – 39；尾崎宏次《国破れてハダカあり》，收入文艺春秋社编《〈文艺春秋〉に見る昭和史》（东京：文艺春秋，1988），第2卷，pp. 46 – 47；*SSS*, p. 284；*TYKS*, pp. 160 – 161。对“西洋化”的肉体的向往，在近代日本早已有之。明治维新之后，热衷现代化的森有礼等人，甚至提议通过与白种人通婚改良日本人的体格。明治时代的版画中的理想的日本人形象，不仅着西装，而且拥有西方人的身高以及身材比例。这一点在日中（1894 – 1895）、日俄（1904 – 1905）战争的版画中最为突出，这些画作中日本人与中国人形象的体格差异，以及日本人形象与俄国人（或其他西方人）的体格相似性非常明显。同样，民间版画描绘明治皇后身着西式服装的形象，将这位“十分娇小、优雅、纤细”的女性，“作为西方化的体格与着装的庄严而杰出的典范”；参见 Julia Meech-Pekarik, *The World of the Meiji Print: Impressions of a New Civilization*（Tokyo: Weatherhill, 1986），pp. 133, 138，以及书中收录的多幅版画。
- 51 榊原昭二《昭和语・60年世相史》（东京：朝日文库，1986），p. 99。川田顺诗中的“老年之恋”，也成了当时的流行语。
- 52 此处坂口安吾的照片，取自林忠彦《カストリ时代 レンズが見た昭和二〇年代・东京》（东京：朝日文库，1987）。这本摄影集是粕取文化的最佳见证之一。
- 53 《日本文学の历史》（东京：中央公论社，1996），第12卷，p. 368。Jay Rubin 在其

重要论文中有引述，参见“From Wholesomeness to Decadence: The Censorship of Literature Under the Allied Occupation”,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11.1 (1985): 71–103, 相关引述见 p. 77。

- 54 Ango Sakaguchi (坂口安吾) 著, Seiji M. Lippit 译, “Discourse on Decadence” (《堕落论》), *Review of Japa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1 (October 1986): 1–5; 原文收入坂口安吾《堕落论》(东京: 角川文库, 1957), pp. 91–102。
- 55 J. Victor Koschmann 对此“主观性”做过详尽辨析, 参见其 *Revolution and Subjectivity in Postwar Jap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The Debate on Subjectivity in Postwar Japan: Foundations of Modernism as a Political Critique”, *Pacific Affairs* 54.4 (Winter 1981–1982): 609–631; 以及“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Debate over Literary Strategy under 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Japan”, 收入 Ernestine Schlant 与 J. Thomas Rimer 编, *Legacies and Ambiguities: Postwar Fiction and Culture in West Germany and Japan* (Washington, D. C. and Baltimor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63–186。
- 56 田村泰次郎第一篇深受关注的作品, 是短篇小说《肉体の悪魔》, 发表于1946年9月。此后, 1947年3月他又发表《肉体の門》, 5月发表论文《肉体が人間である》。戏剧版的《肉体の門》于当年8月首演, 并在接下来的一年中, 创造了在东京各剧院700场演出座无虚席的记录。东宝映画拍摄的同名电影于1948年上映, 此后小说《肉体の門》又数次被改编成电影。“近代への門”的说法, 在田村泰次郎《肉体の門・肉体の悪魔》(东京: 新潮社, 1968)一书中, 奥野健男的解说曾加以引用, p. 221。
- 57 林忠彦《カストリ時代 レンズが見た昭和二〇年代・東京》, p. 144。
- 58 《斜阳》曾于1947年连载发表, 当年12月出版成书。到1948年6月作者自杀时约卖出3万册, 此后“太宰热”兴起。此书的畅销成功, 参见朝日ジャーナル編《ベストセラー物語》(东京: 朝日新闻社, 1967), pp. 44–52。《斜阳》收入9卷本《太宰治全集》(东京: 筑摩书房, 1989), 并由 Donald Keene 译为英文, 参见 *The Setting Sun* (Rutland, Vt.: Tuttle, 1981; New Directions 1956年初版)。下文中对太宰治作品的翻译, 出自本书作者之手。
- 59 《太宰治全集》, 第9卷, pp. 180–181 (参照 Keene 的译文, pp. 114, 124–125)。
- 60 《太宰治全集》, 第9卷, pp. 414–420。亦参见 Donald Keene 《人间失格》的英译文, *No Longer Human* (Rutland, Vt.: Tuttle, 1981; New Directions 1958年初版), pp. 65–70, 73。此处的关键词“illegitimate”(不合法)与“legitimate”(合法), Keene 教授翻译为“irrational”(非理性)与“Rational”(理性)的意思。
- 61 矶田光一《战后史の空間》, pp. 37–38; Rubin 前引之论文, pp. 95–96。
- 62 《太宰治全集》, 第9卷, p. 236 (参照 Keene 的译文, pp. 129, 131, 172–175)。
- 63 《太宰治全集》, 第9卷, pp. 208, 218, 237 (参照 Keene 的译文, pp. 142, 150–151, 174–175)。
- 64 河上的话, 尾崎秀树曾在分析公众对《斜阳》的接受程度的文章中引用过, 收入朝日ジャーナル編《ベストセラー物語》上卷, pp. 44–52 (引文见 p. 47)。
- 65 Masao Maruyama (丸山真男), “From Carnal Literature to Carnal Politics”, *Thought*

and Behavior i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245 – 267。当时其他著名的自由主义和进步批评家的批判，参见清水几太郎《机械时代》一文，载《思想》1950年8月号。1951年8月《思想》关于大众娱乐的特别号上，还刊有清水的另一篇文章。对这些发展脉络的概述，见 Toshihiro Tsuganezawa (津金泽聪广)，“Postwar Trends of Studies in Japanese Popular Culture”，*Occasional Papers*, East-West Center, University of Hawaii (1966): 19 – 23。

66 中村光夫的论文，载《文学》1952年6月号，文章概述参见 Rubin 前引文，pp. 75 – 76。

67 对《完全なる结婚》的分析，参见朝日ジャーナル编《ベストセラー物語》上卷，pp. 16 – 24。德文原书名为 *Die Volkommene Ehe: Eine Studie über ihre Physiologie und Technik*。

68 驹込公平《〈夫妇生活〉始末记》，收入《〈文艺春秋〉に見る昭和史》，第2卷，pp. 322 – 331；此文概述，参见 SSS，pp. 288 – 292。亦参见福岛《战后杂志发掘》，pp. 180 – 186。

69 福岛《战后杂志发掘》，p. 189。

70 福岛《战后杂志发掘》，pp. 105, 177 – 178。

71 此照片见林忠彦《カストリ时代 レンズが見た昭和二〇年代・东京》封面。